論　著

《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所見日籍女教習的中國家政觀 *

周　叙　琪 **

摘　要

《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是服部繁子任豫教女學堂的家事課教習，在授課講義的基礎之上編寫成書。該書標榜「清國適用」，倡導一種結合「中學」與「新知」的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國近世儒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24 年 12 月 6 日），承蒙評論人連玲玲教授提點補入日本女權部分討論。審查過程中又得兩位審查人細心審閱，謹申謝忱。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近代中國家政概念的形成（1895-1920）」的部分成果，編號 113-2423-H-001 -005 -MY3，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2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6 年 1 月 12 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科會延攬補助助理研究學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家政學：「中學」非指中國女教，而是講求以禮盡孝、帶有特殊日本觀點的儒學，重視「男尊女卑」規範的重塑；「新知」為大幅引入「生理學」、科學衛生知識，教導上流社會名媛與外國人往來社交、西餐禮儀等。此一特色與同樣強調「適合中國」的曾紀芬（1852-1942）《聶氏重編家政學》全然不同，後者更關注傳統家訓對主家政者的道德人格追求、標舉「內政總理」的崇高權威，以及中醫陰陽五行理論的「養生」之道。

另一方面，書中關於「家政」和「女權」的論辯也十分引人注目，凸顯中日「家政」在共通的定義下，由於兩國婦女地位的差異，所呈現的性別關係亦有所不同。就此而言，「家政」和「女權」是互斥或互助呢？繁子推行女子新教育是清末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她也在卷首高聲呼籲中國女性應重視家政，以獲得世人之「尊重」，並倡導「女卑」思想，由此將婦女圈限於家庭之中。同一時期中國改革者和女報人也主張婦女可以「家政」對家國作出貢獻，但此一新角色僅是起點，無礙於婦女向外發展或參與公共事務，致力於追求社會制度之平等；又提醒翻譯教科書者須注意日本女權在世界為最卑之弊，以免無形中遭受日本女學之流毒。

關鍵詞：服部繁子、家政學、主婦、女權、日籍女教習

前言與問題意識

在中國近代新知識體系重建的過程中，日本因素在其中擔當重要角色，產生了特殊的影響。清、日之間新知識、新學科的轉譯介紹既繁，人員上的往來交流同樣可觀，這是因爲新式女子教育制度初興，能勝任女校教習者鮮少，此時清、日之間出現一批因私人延聘或清廷官雇，西渡而來的日籍女教習，在近代扮演女性教育新知識、新學科輸入的重要推手。[1]

本文所論服部繁子（1872-1952）的《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乃日籍女教習爲「清國適用」所量身定制的一本家政教科書，作者服部繁子當時正隨丈夫服部宇之吉（1867-1939）旅居北京，爲中國女學校的籌劃和辦學而努力，《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即爲其中一項成果。該書完成於 1907 年 12 月，1908 年 5 月由東京冨山房書局出版，內容具有獨特鮮明的女學觀點：強調女子以治家爲本分，反對職業婦女和參與公共事務。[2] 此一觀點可謂既前進、又保守——倡導女學的實際行動爲清末婦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女子以治家爲本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期待，而

1 據學者的最新統計，當時至少有 131 名渡清的日籍女教習在學堂中工作過，衡諸鳳毛麟角的女學校和女學生來說，足見其比例之重。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国女子教育〉，《教育科學》，期 24（2001 年 3 月），頁 5-34。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中国の派遣〉，《ジェンダー研究》，號 18（2015 年 3 月），頁 73-85。孫長亮，〈清季日本女性教習拾遺〉，《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57-194。

2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東京：冨山房，1908），頁 4-5。

反對職業婦女和參與公共事務卻與改革派人士的女權論述相左，凸顯日本背景的女教習對中國現今社會問題的切身觀察，背後有其特定的女學立場和編輯理念。

服部繁子認爲什麼是「家政學」？什麼是「清國適用」的家政學？就時間軸來看，早前已有倡導「中國適合」的家政學專書，如 1903 年曾紀芬（1852-1942）的《聶氏重編家政學》便以此爲號召，[3] 兩者立基於不同的生產背景，對於「中國適用」家政學的闡述究竟有何異同？而「家政」與「女權」之間的關係，是否可理解爲衝突互斥的不同概念，抑或有相互協調、促進的另一種可能性存在？再就知識版圖而言，當時清、日已出版的家政學書籍不少，該書處於何種位置？這些都是我們亟欲了解的問題。

該書的史料價值，於書題「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即給人一種明確的印象，凸顯近代女子教育跨國遷移背景下，日籍女教習對教科書的知識生產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此與過去學者對於清日女子教育跨國遷移現象的研究，多側重於討論日籍女教習的籍貫、月俸、工作地、聘期年限等訊息，或者關注日籍女教習這一群體的在華活動，有所區別。二是該書主題有其時代重要性，「家政」與「國文」、「修身」課程並列新式女子教育三大科目，[4] 乃考察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時

---

3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最早在 190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隔年又由浙江官書局重印，因商務印書館本難見，本文採用 1904 年浙江官書局版本。

4 「修身」課程與近代以前的女教傳統密切相關，「國文」課程則延續傳統社會婦女文學的學習，相較而言，「家政」課程則是一種新專業，為近代以來塑造「賢妻良母」的核心學科。

期女性新角色和性別內涵轉化的關鍵。[5] 該書反映日本觀點如何作用於清國女子教科書之編纂，又提供了當時流行的漢譯日本教科書以外的另一種視角。三是服部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爲當時京師大學堂的正教習，繁子是他興辦女學的最佳助手，緣於此一政治因素，該書在當時具有相當之出版流通性。這些證據顯示《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廣泛的影響力，以及女子教育議題上的重要性。不過，這份文本目前尚未獲得學界的充分重視，僅韓韡在博士論文中有兩頁的內容簡介，及陳捷對西餐飲食禮儀部分的討論，還未見有專文作論。[6]

服部夫婦爲中日教育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過去關於服

5 晚清女子國文和修身教科書對於新女性典範的形塑，可參見夏曉虹和季家珍的研究成果。Joan Judge(季家珍),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8（2000 年 8 月），頁 129-177。季家珍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卷 12 期 2（2001 年 6 月），頁 1-40。以及季家珍著，李濤、史靜寰譯，〈女性教育中的文化與文本傳播：歷史情境中的 20 世紀早期女性課本〉，《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 8 輯，頁 334-371。Joan Judge, “The Ideology of ‘Good Wives and Wise Mothers’: Meiji Japa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Feminine Modernity in Late Qing China,” in Joshua A. Fogel ed.,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ast Bridge, 2002), pp. 218-248.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以及夏曉虹，〈作為國民常識的晚清女子啟蒙讀物〉，《讀書》，2015 年第 4 期，頁 73-78。

6 韓韡，〈中国近代女子教育における日本受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日本語専攻博士論文，2014 年 3 月），頁 90-92。其他還有陳捷，〈《（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的西洋飲食及西餐禮儀〉，《南國學術》，卷 13 期 3（2023 年 7 月），頁 397-409。

部夫婦來華興學的研究，多聚焦於服部宇之吉的教育貢獻、「賢妻良母」主義的興女學主張，鮮少以服部繁子爲主要研究對象。重要著作如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探討近代日本「賢妻良母」主義向中國傳播之途徑時，便指出下田歌子（1854-1936）以團結東亞爲婦女教育之構想，留學生教育僅是階段性目標，1900 年起她開始拓展中國方面人脈，欲直接向清國輸出此一構想時並不順遂。1902 年赴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的服部宇之吉夫婦，繼承了下田歌子「賢妻良母」的女學思想，成爲下田歌子對清國發揮影響力的重要管道。書中還提及服部宇之吉在華興辦女學，乃是希望矯正今日清國社會的「女尊男卑」，回歸傳統「禮」教的性別理想。[7] 其他如張洪萍、胡韜的〈服部宇之吉與京師大學堂師範館〉、[8] 孫麗青〈服部宇之吉與近代中國教育〉、[9] 閻書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等，[10] 皆聚焦於服部宇之吉在中國高等教育創建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針對繁子的研究雖然缺少，不過加藤恭子在研究日籍女教師群體時，曾提及服部繁子在中國推行女學時所顯示的主動性及其戰略性考量——以符合主流的婦女形象理念，來讓政府公權力或有力者的男性們

7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8 張洪萍、胡韜，〈服部宇之吉與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貴州師範學報》，2014 年第 7 期，頁 52-56。

9 孫麗青，〈服部宇之吉與近代中國教育〉，《齊魯學刊》，2009 年第 3 期，頁 58-61。

10 閻書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心理學報》，2009 年第 5 期，頁 464-470。亦參見閻書昌，《中國心理學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頁 55-58。

接受。[11]

這些研究成果給予我們一定的指引，本文在此基礎之上，以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爲主要研究對象，探討服部繁子的女學立場和編輯理念，如何落實於「爲清國婦女」量身訂制的家政教科書的編寫，呈現出何種特色的家政觀。繁子的著作甚少，她曾寫作〈秋瑾女士の思い出〉（回憶秋瑾女士）記述在北京興女學之事及與秋瑾（1875-1907）的交往經過，有助於我們更了解其女學思想和婦女觀，爲重要輔助資料。[12] 另篇〈支那婦人の特質〉描寫對中國婦女的觀察，[13]〈卒業式の回顧〉爲繁子求學經歷的自述。[14] 此一研究取徑不僅可以回應學界對於東亞世界「賢妻良母」的關注，讓抽象的「賢妻良母」女學思想得以從實際的教材編寫和教學內容角度重新被檢視、更細緻的被討論；也能在過去學者偏重於主要思想人物的考察之外，凸顯

11 加藤恭子，〈明治末の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国派遣〉（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創成科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22）。以及加藤恭子，〈二〇世紀初頭における、中国への日本の女子教員派遣と「東洋婦人会」——中国の女子学校教育の実施にむけた協力活動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史学》，號 57（2014 年 3 月），頁 49-85。

12 另，陳捷曾提及服部元編輯、服部繁子著的《北京日記》，2001 年由私家出版，目前筆者未見。但據陳捷介紹安井小太郎（繁子的姐夫）《寓燕日記》之解題，內容只記繁子來訪等語，可知兩家時相往來，並無更多有用資料可進一步分析繁子思想。陳捷，〈《（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的西洋飲食及西餐禮儀〉，《南國學術》，卷 13 期 3，頁 402。及陳捷，〈安井小太郎《寓燕日記》解題・翻刻〉，《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冊 183（2023 年 3 月），頁 1-58。

13 服部繁子，〈支那婦人の特質〉，《女学世界》，卷 12 號 7（1912 年 5 月），頁 33-38。

14 服部繁子，〈卒業式の回顧〉，《女学世界》，卷 14 號 7（1914 年 5 月），頁 52-55。

較少為人注意的日籍女教習如何論述、詮釋此一婦女新角色，藉此一窺清末女教習的他者之眼對「清國適用」家政學之認知與理解，說明其在中國家政的早期概念之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思想特點，及與此相關中日教育文化交涉的時代意義。

扣緊上述提問，本文在問題意識之後將分為三節：第一，先說明服部繁子撰作《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背景。第二，探討繁子對《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一書的編輯理念，及她如何結合「中學」與「新知」來編輯家政學，呈現出何種「清國適用」之內容特色；並與另本曾紀芬「適合中國」的《聶氏重編家政學》做出比較，凸顯該書從「他者之眼」所見清國適用的獨特觀點。第三，考察該書關於「家政」與「女權」之論辯的具體內容，繁子認為什麼是「女權」？她所指陳「家政」與「女權」之間的矛盾，又是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何種認知？此一看法與同時期國人編譯家政學的觀點有何異同，致時人痛指日本女學是「不可不去之流毒」？而日本方面的女權論者，對於繁子的觀點又有何看法？最後本文將總和上述，做出結論。

一、《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撰作背景

服部繁子是日本著名漢學家島田重禮（1838-1898）的三女，島田重禮長期擔任東京大學支那哲學科第一主任教授，日後在東京、京都兩所帝國大學執掌中國學研究的諸位大家，多出自其門下。繁子曾就讀竹橋女學校（今御茶水女子大學），另於成立學舍女子部學習英文，她在女校畢業後、

結婚前曾擔任教職，學經歷與當時日本知識婦女十分相類。同時，繁子也是下田歌子的愛徒，一生中與老師保持密切又良好的關係。繁子不僅在生活中身體力行「賢妻良母」的女學思想，對於推廣下田歌子「家政學」亦有所貢獻，她在旅居北京數年間與下田歌子的書信往來頻繁，除詳述日籍女教習的活動和中國女學現況外，還爲實踐女學校的中國留學部介紹了許多中國女學童。[15]

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是日本文部省領導中國教育現代化的代表人物，因服部宇之吉爲島田重禮的學生，兩人得以相識結合。服部宇之吉出身武士家庭，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中國哲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重要著作如《清國通考》、《東洋倫理綱要》、《支那研究》、《孔子及孔子教》等；他主編的《漢文大系》22 卷，則是當時最受注目的漢學叢書。歷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哈佛大學教授、東方文化學院院長。

服部宇之吉生平經歷最讓人印象深刻者，在於鑽研書中學問之外，還曾多次親至中國土地，有別於從漢籍經典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由此得以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上擔任第一線的核心角色。他最早的中國經驗起因於 1899 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專任助教授，爲了研究漢學，被日本政府派往中國和德國留學。1900 年 6 月，服部氏在北京遭遇義和團事件，在被包圍的北京列國使館區受困 9 個星期。平安歸國後，服部氏出版《北京籠城日記》[16] 報導此事，名聲漸起。同年 12 月他再赴德國留學。

15 陳妊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03。

16 服部宇之吉，《北京籠城日記》（東京：博文館，1900）。

（一）服部夫婦來華經過與女界交往

庚子事變後，清政府宣布實行教育改革，當時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得知此消息，即令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1865-1936）：「清國教育的實權不應委託給歐美，而日本斷然掌握其實權。」[17] 內田接獲命令，立刻和榮祿（1836-1903）、奕劻（1838-1917）、張百熙（1847-1907）等當道及其幕僚進行接洽與遊說。[18] 1902 年 5 月，張百熙訪問內田公使，明確中日教育合作事宜。日本文部爲京師大學堂師範館選聘教習時，慮及中國朝野對傳統文化的信任和對西學的嚮往，以及當時對學務的急切改革態度，於是精通漢學並曾留學中國、熟悉教育行政管理且專攻德國教授法和研究法的服部宇之吉，成爲最合適的人選。時日本文部大臣緊急將在德留學的服部宇之吉召回，爲符合應聘資格，[19] 先破格授予博士學位，並提升他爲東京大學文科大學教授。

服部氏於 8 月回到日本，9 月便偕同其妻繁子前往中國北京，就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一職。在長達六年半的任期中（1902-1909），服部宇之吉一直扮演中日雙方教育合作的關鍵人物，既是日本方面的代表，又是最貼近清國權力核心的「中國通」，廣泛活躍在學術界、教育界和政界。[20] 服部宇

---

17 服部武，〈服部宇之吉博士（1867-1939）〉，收入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 I 先学を語る（1）》（東京：刀水書房，1973），頁 118。

18 服部武，〈濱尾先生と父〉，《漢学会雑誌》，卷 7 號 3（1939 年 9 月），頁 125-129。

19 當時京師大學堂明確要求所聘教習須為具有教育經驗的文學博士，服部當時只是助教授，迫使文部大臣不得不採取此一權變措施。

20 服部宇之吉的經歷，參見服部武，〈服部宇之吉博士略年譜〉，《東方学》，第 46 輯（1973 年 7 月），頁 185-186。山根幸夫，〈服部宇之吉と中国〉，收入《近代中国のなかの日本人》（東京都：研文出

之吉致力於中日教育交流，但他認爲要在保守的北京短期內建立女子學校是不可能的，故眞正爲興女學奔走的是其妻繁子，她以內助身分，全力協助丈夫教育事業的開展，身處上層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之交會點，爲她提供了參與近代中國婦女教育轉型的絕佳機會。

時北京上層社會男女之別甚嚴，與上海做爲中西文化交流最前沿的通商口岸，風氣較爲開通的情況有所不同；繁子的教習夫人身分具有與上層女性交往的便利，又利用帝國婦人會蒐集情報，[21] 適足以補足服部宇之吉所不及之處，在興辦女學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22] 中提到，早在她將隨夫派往北京赴任前，當時正在東京視察學情的總教習吳汝綸（1840-1903），特別介紹侄女吳芝瑛（1868-1934）與她相識。吳芝瑛的文章詩詞清新典雅，書法技藝超凡脫俗，在京城的上層圈子廣受歡迎和好評，[23] 據說

版社，1994），頁 5-42。劉岳兵，〈服部宇之吉論：孔子教與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收入《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192-233。

21 加藤恭子，〈二〇世紀初頭における、中国への日本の女子教員派遣と「東洋婦人会」——中国の女子学校教育の実施にむけた協力活動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史学》，號 57，頁 57。

22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郭延禮編，《秋瑾研究資料》（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頁 167-170。此文最初以〈婦人革命家 王秋瑾女士の思い出（上）〉為題，刊載於《中國語雜誌》，卷 6 合併號 1-3（1951 年 3 月），但因為該刊停辦，後半部分手稿一直存放於中國研究所未能發表。服部繁子去世後，全文以〈秋瑾女士の思い出〉之題，刊載於《季刊東西交涉》，卷 1 號 3（1982 年 9 月），頁 38-49。

23 惠毓明，〈吳芝瑛夫人傳略〉，收入《吳芝瑛傳》（江蘇：無錫雙飛閣藏版，1936），頁 1b。又，民初顧頡剛曾說：「桐城吳芝瑛書名藉甚，觀其筆姿勁挺而纖細。」參見《顧頡剛讀書筆記》（北京：中華

連慈禧太后都十分欣賞她的字。[24]

繁子抵達北京後，與同樣支持女子新教育的吳芝瑛、歐陽夫人（錫貞）[25] 往來密切，在一段時間的相互接觸、了解彼此思想後，她們合作成立了北京最早的婦女團體──「中國婦女啓明社」。[26] 1904 年正月的一天，歐陽夫人訪問她，講到已和吳芝瑛商定，爲了「我們婦女可以常常聚會開展討論，交流學問」，「想舉辦婦女座談會」，邀請服部夫人指導。該社於正月中旬在西城某會館舉行婦女座談會開幕典禮，肅親王的姐姐、日本公使夫人等都應邀出席。[27]

中國婦女啓明社的創立，並非是限於知交間的小型座談會，而是「以昌明女學、廣開風氣爲目的」，規劃中的發展是「先在北京創立，以後再於各行省漸次推廣，添設分社」，[28] 顯見該組織乃繁子和吳芝瑛、歐陽夫人等宣揚女子新教育的重要推手。章程中還提到：「另延東西各國華族婦女有學術名望、旅居我國者爲名譽員，各分期演說普通女學」。繁子既

書局，2011），頁 263。陳定山〈小萬柳堂與李文忠公全集〉中說：「夫人書法深得歐褚精髓，書名滿大。」《春申續聞：老上海的風華往事》（臺北：世界文物供應社，1976），頁 65。

24 惠毓明，〈吳芝瑛夫人傳略〉，頁 2b。

25 歐陽夫人本名的考證，參見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2000 年 9 月），頁 80。

26 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中並未寫明這個婦女談話會的正式名稱，夏曉虹比對當年《大公報》的報導，指出該組織即是「中國婦女啓明社」。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頁 80。

27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67-170。

28 〈中國婦女啓明社開辦簡章〉，《大公報》（天津），1904 年 3 月 11 日。

被尊稱爲師母，應該是組織中主講者的名譽員身分。[29]

繁子在倡導興辦女學校的奮鬥過程中，結識了女革命家秋瑾，她和秋瑾交往時，兩人觀念上的差異，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繁子對於女學和婦女新角色的觀點。秋瑾爲晚清女界的先覺者，早期居湘期間對婚姻家庭有所不滿，其婚姻理想大抵不脫傳統框架。到了北京以後，秋瑾大量讀到各種新書新報，結識眾多新學之士，思想風貌迅速改變，對爭取男女平權、女子獨立的現代觀念有所領悟。其中與吳芝瑛的交往，是秋瑾破繭而出的重要關鍵，兩人的丈夫爲同事，且秋瑾居京期間，曾借寓吳宅，與吳芝瑛幾乎「無日不相見」，也因此秋瑾得以與服部繁子交往，並常至其家中交談。[30]

服部繁子在〈回憶秋瑾女士〉中提到初見秋瑾是在 1904 年 2 月，中國婦女啓明社在歐陽夫人家舉行的座談會上。會中秋瑾直率的問她：「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繁子回答她：「我是孔子的信徒。」此話並非虛語，繁子的父親爲漢學家，丈夫服部宇之吉是以孔子之徒相標榜、傾心宣揚「孔子教」的代表人物，[31] 提供了她自然接觸中國文化的知識環

---

29 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頁 80。

30 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頁 77-78。

31 陳瑋芬，〈服部宇之吉の「孔子教」論——その「儒教非宗教」說・「易姓革命」說・及び「王道立國」說を中心に——〉，《季刊日本思想史》，期 59（2001 年 9 月），頁 49-68。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第二章〈「漢學」「儒教」「孔子教」與「支那學」由「儒學」的表述論近代日本漢學之內涵與特徵〉，第六章〈服部宇之吉的『孔子教』論——關於『革命』及『國體』說的考察〉。水野博太，〈論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為例〉，《東

境，這句開場白是讓秋瑾明白她能夠了解「革新派」對儒家性別規範的挑戰。接著繁子又解釋道：「說女子有了學問害多益少，這是對婦女的侮辱。」[32] 這番問答顯示繁子與秋瑾對婦女應受教育有所共識，然兩人各自有其鮮明立場，之後更成爲兩人論辯最大的分歧點。

首先，秋瑾極力主張男女平權，認爲中國是男強女弱，女子受壓迫，她要成爲男人一樣的強者。繁子則將性別差異視作一種自然天性，認爲男人本性爲強，女子本性爲弱，男女雖不能同權，作爲人都是平等的，「女子到哪裡也是個女子，要不自卑地、堂堂正正地活著，才能讓男人敬慕」。[33]

其次，秋瑾主張「家庭革命」，認爲「女子當有學問，求自立，不必事事仰給男子」，「吾謂革命當自家庭始」。[34] 在與丈夫王子芳的衝突中，她採取了當時女性十分少見的離家出走方式；而留下兩個幼兒，到日本留學，顯示出她對自主獨立的嚮往。在擺脫丈夫羈絆的同時，也打破了家庭的範圍。[35] 相對的，繁子以成爲「賢妻良母」爲終身目標，專意於輔助丈夫的事業、照顧兒女的生活。她對秋瑾所言「你是你們家庭中的女神」，「你丈夫是女神的崇拜者」，[36] 雖不

洋文化研究》，號 19（2017 年 3 月），頁 33-62。

32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72。

33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73。

34 吳芝瑛，〈紀秋女士遺事〉，《時報》（上海），1907 年 7 月 25 日。

35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79-181。相關討論參見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頁 81。

36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

符合她心目中男強女弱的理想狀態，卻仍屬家庭範圍之內的夫妻關係調整，大約已是她對婦女新角色的接納上限。至於秋瑾欲和男人抗爭的革命思想則超出此範圍之外，被她視爲深具危險性。[37] 之後繁子協助秋瑾東渡日本，秋瑾的革命思想仍然是她心頭最大的隱患，如秋瑾請託繁子助她入學實踐女校，繁子便提到接納入學沒問題，她「還是擔心秋瑾的思想」；而在推薦秋瑾入學後，她依然寫道「秋瑾有過激思想，請（下田歌子）先生多加注意」，及內心很矛盾等語，表達她對秋瑾所從事革命活動的不認同。[38]

（二）豫教女學堂的建立與《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成書

繁子居京期間除了與上述女子新教育的支持者往來之外，到任之初便陸續有官太太三三兩兩來訪，她觀察到這些官太太多出身官宦家庭，尤其滿族婦女總是害怕違背慈禧太后（1835-1908）的意志，對女子新教育不置可否。[39] 透過居留北京的實際調查經驗，繁子和丈夫發現只灌輸女學觀念，未必能在現實生活中推行女學，當時的達官貴人「即使好不容易設立了女學校，也沒有人敢將自己的女兒送到學校上課」。[40] 爲了突破此一困局，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

資料》，頁 174。

37 繁子以「這個有危險思想的秋瑾」稱之。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頁 174-176。

38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87-189。

39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67。

40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錄（下）》（東京：大日本教化圖書，

服部夫婦協助沈均（生卒年不詳）夫婦在北京創辦豫教女學堂，冀望藉助該女學校的實際示範，來消除人們對於女學的疑慮，繁子並任該校的女經理、贊成員和名譽教員、女教習。

豫教女學堂被譽爲「北京女校之嚆矢」，[41] 辦學宗旨「以中等以上女子，施普通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造就賢母良婦爲目的。」[42] 顯然家政科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課程。依據豫教女學堂的創辦時間到《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一書完稿來推算（兩者相距二年），《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即服部繁子任該校的家事課教習，爲了授課需要而編寫相關課程教材，在此底稿之上再修訂成書，此一因由繁子在書中亦有所記述。

繁子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凡例》中提到該書的撰作背景和預設讀者，緣於 1902 年丈夫服部宇之吉應清朝管學大臣 [43] 張百熙之請，出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一職，她隨之來到北京，透過與中國名媛閨秀往來，深入瞭解其風俗人情及家庭狀況，認爲改良中國家庭是中國實現國富民強的迫切要務。然而，當時中國女子教育才剛起步，年歲較大

1941），頁 748-749。

41 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第十五章〈清國教育制度及北京的官立、公立、私立學校〉，頁 207。該書譯自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東京：博文館，1908）。據學者考察，在豫教女學堂創辦前，北京已有十餘所女學校，多數規模甚小或者維持時間很短。就此而言，服部宇之吉所謂「嚆矢」一語，顯然有所誇大。黃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攬要〉，《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5（2015 年 6 月），頁 193-232。

42 〈北京豫教女學堂章程〉，《東方雜誌》（上海），卷 2 期 12（1905 年 1 月），頁 336。

43 服部繁子所言「管學大臣」，即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大臣。

的婦女不便於入學，課本也很緊缺，因此她寫作了一本家政學課本，題爲「清國家庭及學堂用」，以彌補此缺陷。又說「爲學堂課本時，第十一課宜付闕如」，查閱第十一課〈主婦之教育〉在勸導婦女進學堂受教育，故在女學校授課時自可免去這個章節。此處所謂「爲學堂課本」指的就是豫教女學堂，兩者之間的密切關聯，可以從多方面看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學生身分和預設讀者的重合。

北京豫教女學堂的生徒成分，依據 1907 年《順天時報》記者專門對該校全體女學生的家世進行調查，並在報紙上公布的資料顯示：68 名學生全部爲各級官吏和社會名流的女公子或夫人，其中亦包括一些滿族皇室的婦女。前者如直隸候補道京漢鐵路監督陶湘（1870-1940）的兩位女兒，後者如宗室輔國將軍北京公立崇實學堂庶務提調榮熾（生卒年不詳）的夫人榮文（生卒年不詳），便在該校就讀。[44]

檢視《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內容，可以清楚發現其預設讀者並非一般社會大眾的女性，而是上流貴族婦女，與豫教女學堂的生徒成分若合符節。如書中提到主婦經理家計的示範案例是：「月入洋三百元之家庭」和「月入洋百元之家庭」，[45] 這在當時無疑屬於高收入的菁英階層。又或者關於傭人的討論，便有雇工、買賣人身的奴婢等不同種類，以及「中國家庭有用人過多之弊」，[46] 顯示讀者受眾的

---

44 〈記北京豫教女學堂學生情況〉中詳列了 68 名學生的家世出身，亦標明了滿族人等資料。《順天時報》（北京），1907 年 1 月 8 日。收入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第 2 輯下，頁 703-706。

45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66-69。

46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58-61。

家業資產具有相當規模，故家庭成員的組成除了血緣親屬之外，還包括各種不同僱傭身分、服役類型和工作級別的男女奴僕。

又如，該書卷首記錄清廷當局女學政策的轉變：「邇來各處學堂，辦理均有成效，女子教育亦見萌芽。此皆 兩宮聖德所被，不獨中國人民所額慶，即外人亦莫不欽羨也。」[47] 這段對當朝的頌讚之詞，背後隱含服部夫婦來華創立女學的曲折過程，文中提到的關鍵人物慈禧太后，本是反對女學，1902 年所擬的〈欽定學堂章程〉，便忽略婦女教育。1903 年改訂〈奏定學堂章程〉，也並未將婦女教育納入學校制度，而僅是家庭教育的組成部分。同一時期，地方已出現十幾所士紳自發倡建的女學校，主要集中在上海地區，[48] 民間有志興學而持觀望態度者亦不少，氣氛保守的北京僅有幾所教會學校，可以預見政府當局之態度對於女學堂的後續發展至為重要。服部氏多次向慈禧太后和清廷進言興女學的重要性，然成效似乎不彰。[49] 1905 年 9 月豫教女學堂開學，一下子有「十幾個年輕女孩子來上課」，[50] 之後人數不斷增多，達到 70 人左右。該校成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1906 年 8 月慈禧太后終於同意建立官立女學校。

那麼，服部繁子的中文能力如何呢？在中文口語部分，

---

47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

48 較著名的有蘭陵女學（蘇州，1901 年）、務本女學（上海，1902 年）、愛國女學（上海，1902 年）、嚴氏女塾（天津，1902 年）、城東女學（上海，1903 年）、宗孟女學（上海，1903 年）、湖南第一女學堂（長沙，1903 年）等。

49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78-80。

50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錄（下）》，頁 748-749。

繁子是到北京後才開始認真學習，大約足以與名流閨秀交往溝通，[51] 並用於課堂講授。而中文寫作部分，仍須依賴中國人翻譯，「此書原稿請陸君紹治譯爲漢文」，[52] 這固然是因爲繁子的中文能力尚未達到可以合乎中國文法來著書的程度，也跟當時書籍以帶有文言譯詞的主流形式攸關，[53] 由此大大增加了寫作上的困難程度。

現今可見印刷成書的《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是純中文版（未見有日文版本），但該書何以未在中國出版，而是由日本京都大學旁神保町上的冨山房印行呢？就出版文化而言，當時中日文化往來頻繁，翻譯著作亦多，然中國人的著作多由中國出版社印行，從梁啓超（1873-1929）、日本留學生在日本辦的報刊書籍的出版狀況，即可見其大趨勢。[54] 至於日本人在中國寫作的書籍則是交由日方出版。其次，在日本交由冨山房出版，是因爲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兼任冨山房的編輯，以及冨山房以國民教育書籍爲出版

---

51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秋瑾研究資料》，頁 168。

52 服部繁子，〈家政學例言〉，《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譯者陸紹治是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陸紹治的身分考訂，參見陳捷，〈《（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的西洋飲食及西餐禮儀〉，《南國學術》，卷 13 期 3，頁 402。

53 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收入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近代初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 18。

54 梁啟超在日本辦報之事，大家多已熟稔。日本留學生所辦報刊的出版情形，參見周佳榮，《瀛洲華聲：日本中文報刊一百五十年史》（香港：三聯書店，2020）。日本留學生在東京翻譯的家政學課本，由中國人自辦出版社出版者，如叢琯珠，《新編家事教科書》（東京：中國新女界雜誌出版社，1906）。

方向。[55] 當時服部宇之吉正爲冨山房主編《漢文大系》22 卷，[56] 繁子爲中國婦女量身定制的這本家政學新書，與中國文化研究有關，又屬國民教育書籍，故由冨山房出版最爲方便簡捷。在流通上，該書內容是從豫教女學堂的實際教授中生產出來，筆者使用的是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藏本。[57]

二、《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編輯理念與內容特色

（一）服部繁子的編輯理念及其對下田歌子「家政學」的改編

作爲晚清最早一批跨國遷移、促成中國女子教育現代化的日籍女教習，服部繁子對於何爲「適合清國」的家政學，有屬於自己的立場和特定看法。她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凡例》中說：

> 此書意在穩健中庸，不取奇矯過激。探源于理論，求

55 冨山房是日本近代出版業重鎮，從明治到大正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主要以出版國民教育書籍著稱。

56 服部宇之吉與冨山房之間的合作關係，至遲在 19 世紀末便已開始，1892 年所著《倫理學》一書由冨山房刊行。1909 年冨山房出版服部宇之吉校訂的《漢文大系》第 1 卷，而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也於同年印行。

57 上面學生的筆記已經記錄到第九章，封面書有「諶來芳」，可能是學生的名字。筆者將「諶來芳」與順天時報上豫教女學堂的學生名單核對，查無此人，也可能是入學年分不同。另，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本上面無使用過的痕跡，封面底頁有「明治 41.5.6 內交」字樣，「內交」是內務省交付，即明治 41 年 5 月 6 日由內務府交付給帝國圖書館的圖書。

歸于實際，參酌古今，經緯中外。

這段文字有幾個要點：一是繁子強調「穩健中庸」的女學立場，相對於「奇矯過激」；二是書中內容以理論爲本，並注重實際運用；三是編輯策略上爲「參酌古今」與「經緯中外」。

首先，繁子所謂「穩健中庸」或「奇矯過激」的女學立場，即主張今日中國女子教育之目標應在於家政，反對以爭取婦女參政、職業婦女爲主的女權論述。[58] 此一重家政的中庸立場有其主客觀的條件因素，日本是近代東亞「賢妻良母」主義的重要輸出國，繁子的恩師下田歌子爲其中代表人物，這是繁子撰作該書的知識底色。

其次，在地緣上，1904 年在北京創刊的《女子世界》曾有過女權與女學孰者優先的論辯，至 1905 年 3 月已有興女學以爲振興女權之基礎的最終認識，[59] 時居北京的繁子對此教育方針之進展當有所了解，故採取較爲保守、符合中國社會主流對於女學期待的目標；同時也有助於說服清廷的反對勢力，改變其女學政策。此處繁子將「賢妻良母」的女學思想與婦女參政、職業婦女加以對立，顯見她認爲兩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涉及中日國情差異和女權論述的不同立

58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4。

59　《女子世界》該場爭論由蔣維喬〈論中國女權不興之害〉開啟，最終以〈論復女權必以教育為預備〉劃下休止符。參見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關照〉，《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83-92。又，繁子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總論中提到女權「本係女子智德進步發達所生結果」，《女子世界》中引起女學與女權孰者優先之論辯的蔣維喬有類似言論，然兩者用意不同，繁子以此作為反對女權的理由，但蔣維喬並不反對女權，而是用以緩解新學之弊，暫時性認為時機還不夠成熟，此點夏曉虹在文章亦有說明。

場，分析此一問題需要較長的篇幅，留待下節再加詳述。

再者，繁子在編輯策略上強調「參酌古今」與「經緯中外」，在發揮其專業學養之外，也與服部宇之吉的教育及女學思想有所呼應。

1902 年服部宇之吉初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即擬有「論宗教與教育之關係」、「日本學制與歐美異同若何」之教育學試題，[60] 立基於當時中國人最關心的新式教育問題，同時注重中國的教育傳統，非追求西化者所能及。他本人不僅有漢學研究的根基和中國經驗，來華前曾與吳汝綸同在日本文部省聽演講，並有過私下的交談，對中國時事有相當的了解。[61] 服部氏對女子教育的見解，正是在此一重視中國教育的傳統、比較中西日制度的基調上提出。如 1906 年 10 月服部宇之吉在〈女學傳習所開學演說〉中提及：

> 必考究本國文明之性質與程度，斟酌其古來風俗習慣與將來之變化，然後能之，非可妄援外國之例。[62]

該段文字對照「本國文明」與「外國之例」，以及「古來風俗」和「將來變化」，認爲今日女學的內容應就此斟酌考量，不可一味西化。

此一指導思想對於繁子編輯教科書自然有所影響，不過，僅將該書理解爲助夫興學的附加產品是一種過度簡化的

---

60 這些教育學試題，參見《大公報》，1902 年 8 月 12 日、1902 年 10 月 19 日、1902 年 11 月 22 日、1902 年 12 月 22 日、1902 年 12 月 23 日、1903 年 3 月 10 日、1903 年 11 月 8 日、1903 年 4 月 4 日。

61 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北京：雍睦堂叢書本，1944），1902 年 8 月 2 日。相關討論參見周愚文，〈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與對晚清學制建立影響程度的再探討〉，《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卷 60 期 3（2015 年 9 月），頁 133、143。

62 《學部官報》（北京），期 4（1906 年 9 月）。

看法，也忽略了繁子身為作者如何詮釋「家政學」的權威性。

從各方面綜合看來，《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成書與繁子以「孔子信徒」自居，致力於發揚下田恩師「家政學」的學識涵養，有著密切關係。繁子在卷首自言：「此書以中國之人情風俗為經，世界日新之思想為緯。」[63] 可知《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是繁子在受教於下田歌子「家政學」的先行知識之上，同時以結合「中學」與「新知」的最高原則，教導上流貴族婦女應如何管理家務。

那麼，繁子對下田歌子「家政學」做了那些與此一理念相適應的內容調整？為了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以下先說明繁子採用的家政學版本，再將該版本和《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章節內容做一簡介，便於下面進行相關討論。

下田歌子的家政學課本有兩個主要版本：一是 1893 年博文館出版的《家政學》，另一是 1900 年金港堂出版的《新選家政學》。兩個版本內容章節有所差異，《新選家政學》特別突出「家內衛生」和「家事經濟」兩個工作項目。依據繁子的年齡推斷，早年她受教於下田歌子時，下田氏講授的「家政學」內容應較接近博文館出版的《家政學》。但以繁子對女學之關心和恩師的密切聯繫，1900 年金港堂出版的《新選家政學》因時間較近，且為恩師作品的更成熟版本，才是她據以參考的家政學底本。兩相比對後，可以發現繁子將「家庭衛生」和「家庭經濟」置於核心位置，與《新選家政學》一書有同工之妙。

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界定「家政學」是研究婦女職責相關家庭事務的一門學問，範圍包括衣食住、錢財出納、

63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7。

人際往來、教育子女和役使僕人等。書中將「家內衛生」和「家事經濟」列於書首，足見看重。下田氏說明這是因爲「衛生」是文明之民必要的知識，故經營一家者須特別注意家內衛生。[64] 而「家事經濟」則關乎國家富強，所謂國欲富饒，必要家先富裕；民富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實甚容易。[65] 據此，下田歌子藉由家政學的系統論述，爲女性的家務責任提供一種政治化的新視角，將之與貢獻國家連結起來。

64 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東京：金港堂，1900），頁 12。
65 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頁 35。

表 1　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各章的主要內容

上卷	第一章 總論	從男女分工的天賦職責，明確提出主婦作為一家主宰對家庭經營的重要性，說明主婦管理家政需注意之概要。
	第二章 家內衛生	主婦於家內衛生，需注意預防傳染病、空氣流通和飲食滋養，以保持身體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
	第三章 家事經濟	從家富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的角度，說明家事經濟在出納、貯蓄和購物時宜注意之事。
	第四章 飲食	講述各種食物的營養價值，以及料理、貯存之法。
	第五章 衣服	講述衣服的材質、縫紉和保存。
	第六章 住居	說明居宅對人身心的影響，介紹房屋建築、庭園的構造、室內裝飾、家具配置等。
下卷	第一章 小兒教養	指出胎教的重要性，探討孕婦在衣食住、生產、哺乳需注意之處，以及嬰兒在衣食住、生齒疾病、種痘和遊戲等方面的撫育重點。
	第二章 家庭教育	教育幼兒的價值和鍊養要點。
	第三章 養老	奉養老人的衣食住注意事項。
	第四章 看病	說明與治病相關的負傷及中毒、擇醫、病室和看護方法。
	第五章 交際	說明與交際往來中待客、宴客、書信和餽贈之原則。
	第六章 避難	火災、風害、震災、水害、盜賊的防範要點。
	第七章 婢僕使役	說明婢僕的雇傭、役使和對待方式。

從章節架構來看，《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立基於下田歌子家政學，並將結合中國文化和西方新知這一宗旨貫徹其中，由此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六章）主要以中國人情風俗爲主，輔以西方新知展開討論。第七章爲家庭經濟。第二部分（八到十三章）以西方新知爲主，修正或適

應中國人情風俗。此一以中西文化爲分類的新架構，促使繁子將下田氏《新選家政學》下卷的〈養老〉、〈僕婢役使〉等與中國家庭相關者，往前移到《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前半部。

第一部分對中國人情風俗的關注，主要依循孝道之禮展開論述，包括以孝爲本、祭祖以禮、孝養舅姑和撫育子女（延續香火）。如第一章〈家庭〉即明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家庭是一以「禮」規範的人倫體系，父系小宗的親屬爲主要範圍，也是同居共財的界線，其核心在於對孝道的根本重視，這是中西家庭制度最大不同之處，從中衍生對於家政學的研究也應採取與此相適應的差異觀點。書中說：「泰西風俗，男女年過弱冠，即離雙親，而自謀生計，父子異產，子不必有應奉養父母之義務」。[66] 然而，「中國風俗習慣，與歐美不同，而其搆成家庭，必以父母爲不可缺少之要素。故夫婦爲家庭之中心，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主人主婦善盡奉事教養之道，以合於孝經所云，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宗旨，然後再推及其餘，以使家庭日臻發達，仰事俯育，綽有餘裕。」[67] 掌握這個中國家庭對「研脩人紀」[68] 的中心意義後，書中順著此一思維，說明主婦在家庭「奉事教養」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道德人格（第二章〈主婦〉），再依序就各項重要家務的管理加以討論，如敬祖祭祀（第三章）、奉養父母（第四章）、教養子女（第五章）、用人（第六章）等。

---

66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9。
67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2。
68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2。

表 2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各章的主要內容

目次	內容要點
總論	說明女子之天職與家政學之必要性。強調中國婦女不宜仿效歐美的女子職業，或者屢言女權、專重學術，而輕視家政一科，致遭人詬惡。
第一章 家庭	說明家庭的定義和要素，指出中國家庭以孝為本和三代同居之特點，與歐美小家庭制度有別。
第二章 主婦	界定主婦之義，認為主婦之精神重於仁愛、忍讓，且主婦須有常識，因其有保護監督家族及家人之責任。
第三章 崇敬祖先	中國以崇敬祖先成全孝道，主婦有祭祀祖先之義務。
第四章 奉養父母	主婦奉養父母以敬為本，以精神之慰安為要。
第五章 教養子女	主婦善於教養子女孝道乃全，教養子女的要目包含胎育、哺育和家庭教育三者。
第六章 用人	說明挑選、監督雇人之要旨，對待奴婢以寬厚為宜，以及訓戒獎勵之法；並指出中國家庭用人過多之弊。
第七章 家庭經濟	說明主婦對於家庭經濟之責任的重要性，且一家經濟之旨在儉不在吝。書中歸納中國經理家計的三種類型，同時教導主婦利用貯蓄法、支出預算表和保險法等，來調理家庭經濟，一點一滴地累積財富。
第八章 家庭衛生附生理大要	基於衛生之必要，須明衛生與生理之關係。故該章附有生理大要，分就骨骼系統、筋肉系統、皮膚系統、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神經系統、五管器系統等加以介紹。在此生理科學的認知基礎上，說明衛生要旨、看護急救和生產衛生之法。
第九章 衣食住	探討衣服、飲食和居住等日常家務的經營要點。
第十章 交際須知	該章專講與外國人交際之法，包括禮節習慣、

	敬愛誠實之心、待賓宴客、園遊會之注意事項和餽贈等。
第十一章　主婦之教育	強調主婦修學之必要，學習應以國文為根本，兼及其他必要者（史地、家政算學）。
第十二章　婦人之娛樂	認為中國婦人喜愛之葉子牌不甚雅，宜培養打毬、音樂唱歌之愛好，最為有益。
第十三章　婦人之修容	主張修容不重在美豔，而應符合衛生之法，應以適宜的飲食、運動、執務、休息、娛樂相互搭配，以進德為經，以健康為緯，乃修容之真義。

第七章〈家庭經濟〉是家政學的核心項目，書中說：「凡一家之經濟中重大事項，其責任屬主人。至於家室日用纖毫瑣事，則責歸主婦。」夫與妻在家庭經濟中承擔不同的職責由來已久，到了近代受到西方「家政學」新學科、新知識之影響，特別側重婦人對「家庭經濟」的調理，教導主婦如何透過理性消費來保存家庭財富。

第二部分引入西方新知教育婦女，如第八章〈家庭衛生〉從西醫科學理論闡述衛生與生理之關係，第九章〈衣食住〉說明如何將前章的醫學理論新知具體落實於衣食住各項日常生活家務的操作中。第十章〈交際須知〉專講主婦與外國人的交往，對於外國的禮儀習慣有諸多討論，彰顯時代變遷過程中主婦在管理家務時應以傳統禮儀爲內核，同時關注近代世界局勢的變化，擴大對於外國禮儀的認識和學習。第十一章〈主婦之教育〉倡導興女學的必要性，「中國現知女子教育爲當務之急，……今日之學生，即他日之主婦」。[69] 第十二、十三章討論婦女之娛樂和修容，引入西方的音樂唱

69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60-161。

歌、打毬網球等娛樂方式，又強調衛生健康的身體遠勝於塗朱飾粉之美。

（二）《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內容特色

比較《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與下田歌子《新撰家政學》兩書在知識內容上的差異，大約可歸納爲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婦女的家庭職責與精神人格：下田歌子在「家政學」中從性別分工（男外女內，分職任事）以及性別的天賦氣質的角度（婦人心思愼密而善治家政），爲主婦的家政職責立論。

繁子繼承這種觀點，並進一步從中國傳統以禮盡孝的觀點出發，揭示兩項專屬於中國主婦的精神──「仁愛」與「忍耐」。繁子解釋所謂「仁愛」，即是孔子所謂的「仁」，包含同情與愛情二者，同情者推己及人，愛情莫先於骨肉。書中說：「使主婦有仁愛之心，則上必孝于其翁姑，內必順於其夫子，比鄰讚德，里閭稱賢。」這是因爲婦人「易於熱中（日文「熱中」意爲事物所吸引、入迷）」和「易於感動」之性，「苟使無仁愛之本根，則其所熱中感動，未必中節」。繁子還認爲「仁愛」也是夫妻感情灰滅後，婚姻得以持續維繫的內在要素，「古者織錦字以郵封異域，削鼻準以表示赤心」，這些節烈事蹟皆因一片仁愛之情。[70]

接著，繁子指出「忍耐」亦爲主婦最要之德，這是因爲家庭事務本甚繁難，有翁姑子女、長輩同輩晚輩、男女僕役和管事等不同類別的人需要照顧管理。另一方面，中日兩國

---

[70]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4。

對於婦女守貞有著全然不同的規範，故「忍耐」之德對於中國主婦更爲重要。書中說：「中國社會之制裁最嚴，一經結婚，終身不能改嫁，故婦人雖處極不得意之時，少（稍）知自愛者，無不顧及廉恥，保其貞節，此即中國人富于忍耐之明證，余所感服不遑者也。」繁子反對以身殉夫，認爲是忍耐之功尚未養到，因爲守貞治家較諸殉夫艱難，方是愛夫又愛家之眞情。因此繁子提議將「仁愛」與「忍耐」合在一起考量，「使徒之忍耐，而無愛情，則其忍耐必不得永續。」若婦人能具有熱誠之仁愛與兼顧之忍耐，在其夫年少未顯時，仍能竭盡身心，經營整理家務，以勸勵而佐助之，乃是內助最爲珍貴之處。[71]

繁子對於主婦之德——「仁愛」和「忍耐」的討論，讀來與中國儒家文化觀念頗有一些不同之處。「仁」爲孔子思想核心，包含「立愛自親始」的等差之愛，和本乎「忠恕之道」生發的「一體之仁」，也就是家庭人倫關係中的孝悌之愛是行仁的起點，並以此不斷的擴充，推廣到社會生活之中，「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不過，中國傳統「仁愛」主要是針對君子的道德修養進行討論，很少用在婦女身上或詮釋女貞之道。至於諺語中的「婦人之仁」，則是指婦女的仁慈之心，處事姑息優柔，不識大體。可以說這些爲人所熟知與「仁愛」相關的基本意涵，和繁子在書中用來討論婦女守貞，或在家庭人倫關係中的和諧圓融，相當不同。在中國傳統家訓或女訓的內容中類似問題的討論，更常見直接以「孝舅姑」、「敬事夫」勸戒婦女，而非從孔子「仁學」這樣一套倫理、道德之學，來教導婦女在家庭中的行爲準則，因爲

71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6。

從「仁學」到具體的日常行爲規範，尚有相當大的距離。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推測與繁子以「孔子信徒」自居的儒學理解有關。綜觀繁子的家政學課本中特別重視「禮」的討論（如以孝爲本、祭祖、孝養，以及比較中、西、日禮儀之差異），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入手方式，與服部宇之吉非常接近，可以合理推測是受其影響。服部宇之吉在近代日本倡導「孔子教」時，認爲唯有透過對社會風習（即「禮」）的研究，才能夠眞正理解中國思想文化的實質，故將研究關懷聚焦於中國古代的禮法制度。[72] 另一方面，日本籍的繁子對於前近代中國的女訓書並不那麼熟悉（或者也可能是不那麼看重），因此未能援用中國自有的文本內容，來闡述婦女管理家政的道德修養，致有此違和感。

關於中國婦女的守貞問題，繁子提出以「愛情」調和「忍耐」，化解守貞不得永續，這種看法帶有一種濃厚的理想色彩，忽略了明清時期的貞節制度有著極其複雜多樣的社會脈絡。

事實上，繁子觀察到公共領域（「中國社會之制裁」）將貞節視爲婦女的道德楷模，固然是貞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卻不僅止於此；在家庭內部，守貞婦女是煩惱和衝突的源頭，給家人帶來種種困難：包括是否選擇違背父母的意願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在激烈的財產爭奪過程中，守寡婦女被看成對家庭或家族中其他成員有經濟利益上的威脅；[73] 至

72 繁子的父親和丈夫皆為日本儒學者的代表人物，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深受日本儒學的影響，自不待言。但並沒有更多的明確線索和豐富內容，可以進一步說明該本家政學是否表現出一種日本儒學的主婦觀點。

73 著名的例子是《雙節堂庸訓》的作者汪輝祖在序言中自陳他的成長

於寡婦本身也並非僅是被迫接受社會制裁，她們也可以反過來利用守貞爲自己爭取最有利的生活條件，甚至以此獨特的道德資本轉化成影響力或權力，從而削弱傳統的性別等級、輩分原則對她們的限制，擴大自己對於生活的控制力。[74]

第二、在介紹西方新知部分：這部分是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最爲突出之處，「家庭衛生」相關章節側重從西醫科學實證的角度介紹各類食物的營養成分，包括蛋白質、澱粉、糖分、水分、灰份[75]等，以進行有系統的預防醫學，並據此爲不同工作性質（勞心或勞力）者擬定合適的菜單，

史，提到他幼年喪父後，「諸父輩」謀奪他家產業，而他的兩個母親（嫡母和生母）如何為了保全他而吃盡各種苦頭，終於能夠守貞全節將他撫養長大。汪輝祖，〈顯妣王太宜人軼事〉和〈顯生妣徐太宜人軼事〉，收入《雙節堂庸訓》（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頁16、21-22。

74 關於明清貞節制度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不同思路的研究如素曼恩，〈寡婦在清代宗族社會、等級和地域結構中的位置〉，收入蘆葦菁等編，《蘭閨史蹤：曼蘇恩明清與近代性別家庭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1-26。蘆葦菁著，秦立彥譯，《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卷10期2（1999年6月），頁29-76。費絲言，《從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98）。關於研究成果的綜合討論，如林麗月，〈從性別發現傳統：明代婦女史研究的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3（2005年12月），頁3-6。衣若蘭，〈最近臺灣地區明清婦女史研究學位論文評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6（1998年8月），頁176-178。衣若蘭，〈近十年兩岸明代婦女史研究評述〉，《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25（1997年6月），頁349-355。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卷7期2（1996年6月），頁145-147。

75 「灰份」為無機物質，其中成分大多是礦物質，其餘則是無機鹽和無機氧化物。

攝取均衡的營養，保持人體康健。

繁子延續此一以西醫理論爲主的「家庭衛生」論述，並就她自身對中國社會所觀察到重大疾病的衛生問題，補充醫學新知。如書中提到：「中國所謂癆病者，即肺病也。此症於中國甚多，是因中國人既無衛生之知識，豫防法及消毒法，均未經考求，於不知不識之間，病毒傳播也。」[76] 患者每咳嗽常帶痰，痰中必帶血，當時社會將肺癆視爲不治之症。但繁子以日本肺癆患者的治癒實例，反駁中國這種社會共識，強調「肺癆非必不治之症也。俗語云，看護第一，醫師第二。看護之任，亦大矣哉。」[77] 這是因爲肺癆以感冒爲近因，故不可輕視受風，在日常生活中更宜注意肺病菌之傳播，凡患肺病者不可隨地吐痰。而隨著病勢愈增，營養愈不足，在服藥和遷地調養之外，須使精神常安逸，多用富於滋養的食物。凡此諸事，皆需看護者的細心、勤勉之照料。[78]

又如，書中提到：「中國所謂傷寒者，即外國所謂窒扶斯（enteric fever）[79] 者也，爲極惡性之感冒，其徵候每日熱度增高，至六七日遂侵腦。此病，療治看護均得法，則絕非礙難之症，若療治不得當，則有生命之虞。」[80] 這種流行於清末民初社會的傷寒病，青少年染病而殤者甚多，即使是看得起西醫或中醫的上等富裕家庭，亦不能免於病難。繁子清

---

76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18。

77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19。

78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18-120。

79 此處英文是筆者所加。enteric fever 為一種腸熱病，清末時的漢語譯名為腸熱症，後受日本影響，音譯為腸窒扶斯，又稱為濕溫傷寒、腸傷寒、傷寒熱。

80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16。

楚指出該種傷寒是因腸壁間生細菌而腫爛，故看護的要點在於：「固質（肉米麵之類）不可通過，故一定之期限，必僅用流質（牛乳湯粥等），俟腸壁復原，方可用固質。」又叮嚀道：此時家人不可因病人思食之念而妥協，導致病症反覆加重而猝死。在處理傷寒病者的排泄物上，必須以三十倍的石炭酸水或石灰水滅殺細菌，不可未經消毒即傾注於廁，以致傳染給他人。[81]

另一個顯著的差異是繁子在書中大篇幅增加生理學的討論，爲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所無。下田歌子認爲「衛生」分爲公眾衛生和個人衛生兩種，而個人衛生對於家庭之關係最爲密切，大半屬於主婦的責任。繁子延續這種看法，並提出一種特殊觀點：「欲講衛生，必須先明生理」，也就是要對研究人體之組織及官能之「生理學」有大概的了解。書中說：「人之一身，以骨骼爲基礎，筋肉爲纓絡，皮膚爲保障。凡若干器官存於內部，各司所能。」[82] 據此將人類生理分爲九項加以說明：骨骼系統、筋肉系統、皮膚系統、循環系統、呼吸系統、消化系統、泌尿系統、神經系統、五器官系統。這九項系統的解說，每項皆附有清楚、詳細的相關器官解剖圖，甚或一項不只一幅，爲求詳細還有多角度、或特定局部放大的器官解剖圖，如骨骼系統即有「全身骨骼圖」、「頭骨圖」、「脊柱」、「肩帶」、「上肢骨骼」、「下肢骨骼」等。

繁子將「生理學」納入家政學內容的做法，不見於同時期的他本家政學教科書，乃開風氣之先。這種注重「生理學」

---

81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17-118。

82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74。

的觀點也導致該章篇幅上的大幅膨脹，光是對九項系統的解說和器官解剖圖就有 34 頁，占原書近 20%，可謂不容忽視的巨型存在，由此留給讀者深刻之印象。

令人好奇的是：繁子這種將「生理學」納入「家庭衛生」的寫作，且使之成爲重要組成部分的想法從何而來？顯然不是來自下田歌子的教導，而與丈夫服部宇之吉關注「生理學」的課程規劃相合。服部宇之吉在擔任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正教習期間，主要教授心理學和倫理學，在教授心理學的過程中，服部氏發現師範館的學生參差不齊，特別是對於博物學和生理學相當生疏，[83] 1903 年 4 月，大學堂增設生理學，聘請日人牧田教授，此次對師範館的課程規劃加以修改，應是出於服部宇之吉的建議。[84] 從《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也加入大量的生理學內容看來，服部宇之吉側重「生理學」的中國教育觀點，不僅對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規劃有所貢獻，還透過繁子教授、寫作家政學的行動，對女子教育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第三、與上流貴族社會社交活動相關的日常禮儀：這部分全然不見於下田歌子「家政學」，而是繁子爲豫教女學堂的女學生所量身定制。該書第十章〈交際須知〉標示「專就與外人之交際而言」，並強調「今日之交際不能復如昔日之

83 服部宇之吉說：「初入學堂，物理、化學以致博物、生理等諸學均未嘗學習，而遽進以心理學，教之既難，學者亦不易。」其中物理和化學等格致之學，多數學生在進入大學堂前已有涉獵，因這兩科是入學考的考試科目。相較之下，博物學和生理學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是「未嘗學習」（沒考過）。服部宇之吉，〈心理學講義凡例〉，《心理學講義》（東京：東亞公司，1905），頁 1。

84 張洪萍、胡韜，〈服部宇之吉與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貴州師範學報》，頁 128-130。

單純，與外人交際，必在所不免」，[85] 顯見就交際對象而言，此一與「歐美日婦女」（書中自言），且爲身分貴重的外交官夫人，或如繁子這類教育界重要人士的眷屬等往來，是名媛閨秀不可抗拒之事，這與當時社會大眾的生活狀況，應有明顯區別。更從內容上來看，文中所載的往來應對和西餐禮儀皆十足繁複，表明這是專屬於上層貴族家庭之間的酬應，而非一般平民家庭的人情往來。如書中提到歐美婦女概於一定之日見客，時間約在午後 4-6 點之間。日本婦女在見客之日外，亦不忌客。初次會晤，只談普通應酬話，時間應簡短。忌問主人年歲、衣服、器具的價值等事，談話的時候要注意不可任意吐痰，此等禮儀中外有異，易招致外國人的輕侮嫌惡。[86]

在宴客方面尤其講究，從餐桌花材的選用、餐巾的鮮潔和折疊方式（光是酒杯中的飾布就示範了三種不同折法）、各種餐具的擺放位置和使用方法、供菜的順序（從冷菜或湯，終於點心，再剖食桌上的果子。餐後移至客室供咖啡或酒，或爲適宜的遊戲），乃至食中奏樂的注意事項等。同時，繁子還詳細的講解西餐的刀叉使用、用餐順序和應注意的禮儀，如「麵包不可用刀切，應用紙撮取而食之，魚類不用刀，右手持麵包小片，用叉斷魚，爲適宜之塊而食之。」[87] 如此各項細節娓娓道來，足當一堂西餐禮儀課。

書中特別提醒多項中西飲食習慣的不同之處，如「主人用自己食箸爲客讓菜，雖表恭敬之意，外國人則不甚悅

---

85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44。

86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45-146。

87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47-152、155-157。

之，……故饗外國人時，可免去此禮節」。又或者，「饗燕方酣，離席辭謝，在中國爲普通之事，而外國決無此例，尤足以害主人之感情，宜留心焉」。[88] 其他如中外請柬的習慣不同、約定不可遲到、握手禮的注意事項等，不一一贅述。上述各類事項及其相關禮節的細節描述，皆表明隨著近代世界局勢的變化，上層貴族婦女在國際交際中扮演重要角色，故繁子提出女子走出家門，廣泛展開社會交往時，必須注重自身思想與智識的增進，擴充「禮」相關的文化教養，不可拘泥於中國舊有習俗。[89]

其他在全書的衣、食、住等日常生活部分，繁子也做了許多與中國民情相適應的調整或建言，如小兒遊戲、衣服購置、飲食安排、房屋居住等。這些差異主要因應不同地區、氣候之需要而有彈性的安排，並未有固定的操作方式，亦不限於中日兩國的差異，即使中國人自著的不同家政教科書中也常見不同的敘述（如南北差異），大抵是在順應各書的整體家政觀的前提下，採取不同的寫作方式。

此外，在「家庭經濟」部分，繁子預定的上流貴族婦女讀者與下田氏的中流階層婦女讀者，在經濟階級上有極大差距，但繁子仍延續下田氏以節儉爲主的思路，明確指出婦女所任經濟，以量入制出的節儉法爲主（有別於積極性的殖利法），[90] 故〈家庭經濟〉一章的內容側重在教導主婦如何依據家庭收入製作支出預算表，以撙節家用，並將節儉所餘零碎錢項，利用新興的保險法、銀行郵局儲蓄、不同豫備銀口

88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52、157。

89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44-145。

90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65。

袋等，點滴積累以儲蓄富家。

綜上所述，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標榜結合中學與新知之理念，立基於下田氏《新選家政學》所進行「清國適用」的編輯，所謂「參酌古今」，「古」與中國傳統女教書的內容無涉，而是一種帶有特殊日本觀點的儒學，以「禮」盡孝的精神將中西家庭制度區別開來。這種「他者之眼」對於中國貞節制度的觀察，顯得較爲淺層和單一，而忽略了其中複雜的社會脈絡，婦女守貞並非全然是被動性的被迫接受，也可以是主動性的用來作爲性別秩序的突破口。其次，該書在新知方面大幅引入西方生理學知識、中國當前重大疾病的最新治療方式，以及教導上流社會名媛與外國人往來社交和西餐禮儀、多種與中國民情相適應的衣食住之家務技藝等。

相較之下，1903 年出版曾紀芬的《聶氏重編家政學》，具有鮮明的士紳菁英階層之特色，她以「適合中國」爲理念，對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進行重編，則展現出與繁子著作全然不同的面貌。關於《聶氏重編家政學》這份文本，過去已有專文作論，指出曾紀芬對「家政學」的理解，融合了中國傳統治家觀與西方新學科，書中所描繪的「內政總理」亦不同於下田歌子的「專業主婦」。[91] 立基於過去的研究成果，以下就婦女職責、家庭衛生和社交餐敘三部分，述其與《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之異同。

首先，就婦女的職責和精神人格而言，曾紀芬是從中國

91 關於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的研究，參見周叙琪，〈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3（2024 年 6 月），頁 1-57。

傳統「女主內」的經典論述，以及她個人的治家經驗，來理解下田氏「家政學」所主張依據不同性別的天賦本質實施差別教育的觀念，由於兩者思路相似，故成爲曾紀芬理解「家政學」的受容點。不過，曾紀芬在書中將「家庭教育」、「家庭表率」和「理財」三者視爲家政核心，與下田氏強調「家庭衛生」、「家庭經濟」的觀點，明顯有所區別。「家庭表率」關注治家者的道德問題，是中國傳統主家政者的重要人格特質，常見於訓誡子孫的家訓和教子孫以家政的書籍中，下田氏原書中並無此章，也與繁子以「男尊女卑」代表中國禮教，有所不同。固然，曾紀芬在書中主張堅守傳統「婦道」（《禮經》的德、言、容、功），但她同樣關注仕紳之妻在清代社會流動和家庭策略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特別以「內政總理」一語凸顯主婦對家庭的貢獻，從中衍生而出的家庭性別權力關係（參見下節），也與下田氏和繁子的單向「尊夫」觀點有所差異。

其次，關於「家庭衛生」問題的討論，下田歌子和服部繁子皆從西方科學理論來討論（細菌）疾病和健康，下田氏在書中更花了許多篇幅講解以西方營養學爲準的菜單設計，及保存營養的料理手法。相較而言，《聶氏重編家政學》討論的「衛生」，主要是以中國傳統醫學「養生」爲基本內涵，與現代意義的「衛生」概念有所不同。從中醫的養生之道出發，與之相適應的烹調方式不在強調營養成分的保存，而是提倡一種「適中而止」的中庸之道（不寒不燥），以五行理論爲基礎的五味調和。

最後，繁子關於中西日三處社交餐敘、人際往來的禮儀的大篇幅討論，下田歌子和曾紀芬並未特別提及，這當然並

不是因爲下田歌子和曾紀芬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下田氏作爲活躍於日本女學第一線的代表人物，自不乏與各國人物往來經驗，何況她還曾出國數年考察歐美女子教育。至於曾紀芬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中學與西學並重，父親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重要推手之一，哥哥曾紀澤曾任外交大使，攜親眷遠赴重洋。結婚後，丈夫聶緝椝曾任上海製造局（即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總辦，兒子們多爲上海著名的實業家，曾紀芬亦不乏與洋人婦女來往的經驗。[92]

如此，我們或許應該問：爲什麼繁子所寫作的家政學課本特別關注這個問題？一種可能是繁子本身注重中西日三國的比較，如書中提到的家庭制度、婦女地位（職業婦女、婦女參政權等）、女子教育等，延續此一編輯思路，繁子既以「禮」爲中國文化特色，故社交、西餐相關禮儀亦成爲中西日比較的重要議題。另一種可能與書籍讀者有關。該書撰作時，部分中國人與外人已有接觸、往來和吃西餐的機會，但西洋飲食和西餐禮儀的知識尚未普及。[93]《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的授課對象多爲北京達官顯要的女公子，將來必面臨與外人交際之事，也許因應學生家長之要求而增添該部分的內容，預做學習。

至於《聶氏重編家政學》基於「中國適用」對其他家庭瑣務的小幅改寫，大多與中日氣候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有關，這點與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頗有相類

92 如曾紀芬在自傳中曾提及與傅蘭雅之妻的往來經過。《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上海：京城印書局，1933），光緒 13 年，頁 16b。

93 陳捷，〈《（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的西洋飲食及西餐禮儀〉，《南國學術》，卷 13 期 3，頁 408。

之處。不過，這些細部更動無關宏旨，於文本觀點的閱讀詮釋影響不大。此外，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強調的「中國適合」，與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強調的「清國適用」，整體而言還反映出中日婦女地位的大不相同，我們將在下節說明。

三、「家政」與「女權」之論辯：《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所見婦女新角色

近代中國思想轉型過程中，改革人士倡導婦女解放運動的焦點，包含纏足、女子教育、女性參政權和職業婦女等多種不同面向，繁子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對「女權」的界定與討論，與我們所熟悉的時人之論，在共相中又有其特殊之處。

首先，繁子界定的「女權」偏於一種個人私德，即世人對女子的尊重，取決於女子能否盡到治家育兒的國民義務，反對當時主張爭取參政權、經濟權等相關之制度平等的「女權」論述。該書卷首〈總論．女權與女子智育之關係〉明確指出：女子教育之目的在於主內持家，若女子能盡其心力以治家教養子女，則能與男子內外相應，由此國運日進，國家可與列強抗衡。[94] 如此，「世人對女子之觀念，必將一變其從前之鄙夷，而爲尊重，女權不求而自得也。」[95] 將中國婦女新角色圈限於家庭之內，女子權利的獲得則冀望於「尊

94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3。
95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5。

重」。

接著，繁子進一步提到其他幾種婦女新角色作爲對照組，並以不適合中國而加以否決，呼籲女性回歸家庭、重視家政。如「泰西之女子，爲法律家者有之，爲船長者，亦有之。」繁子認爲這種職業婦女是一種偏離常態的異常狀況，並不適合中國社會：「歐美各國另有特別之理由，因生此極端之結果」，「況社會之情形大不同于歐美者，今遽欲模而仿之，何能免於識者之譏乎」。[96]

書中同時提到：「余近聞中國婦女屢言女權，竊有憂焉。夫女權者，本係女子智德進步發達所生結果，非可襲而取之也。故以爲將來之希望則可，以爲現在之目的則不可。」[97]「女子善教子成賢，其功優於女權是事也。」[98] 又說：「余見中國現今女子，專注重於學術，而輕視家政一科，心竊憂焉。於此著作此書，使中國女子心得整理家政之要，以便盡其本分。」[99] 此處繁子所稱「女權」、「注重學術」，與晚清女子受教育、辦報（及相關組織），注重新學新知之研究與傳播的特殊現象密切相關。在 1907 年底繁子完成該書之前，中國女性在本國和東京出版的女性報刊已達 22 種，[100] 女子留日爲清末留日熱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留日女學生共組建了 5 個組織，包括著名的共愛會、中國留日女學生

---

96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2-3。

97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4。

98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5。

99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7。

100 羅秀美，〈從閨閣女詩人到公共啟蒙者——以近代女性報刊中的論說文為主要視域〉，《興大中文學報》，期 22（2007 年 12 月），頁 35-38。

會、女子復權會等。[101] 對於這些女報人而言，婦女的實際作爲並不只侷限於以家政協助男子達成強國、救國的使命，還在於參與社會、政治等公共事務，乃至於成爲「世界主義的婦人」。[102] 繁子有過較多交往的秋瑾的革命女權思想僅是其中一種，尚有燕斌（1869-1931）的女性參政權，何震（1886-約 1920）的無政府主義女權思想等。[103] 對於這些不同的「女權」論述，繁子反覆以「憂」、「竊憂」來強調其中潛藏的巨大風險，並以撰作「家政學」的實際行動力圖矯正此一過激的婦女解放風潮。

在重家政抑女權的前提之下，繁子還極力鼓吹中國婦女在家庭之內應貫徹「以夫爲尊」、「爲人後」的準則，如「遇有主婦欲爲之事，而其夫先定辦事之方針，時即主婦之見識或勝於其夫，不可即反對夫子之言，宜徐開陳自己意見，往復比較，庶幾夫可反省」。即使面對自尊自負的丈夫，也必須「循漸序商勸，使夫樂從」，甚至「一勸之不已，至於再，至於三，甚至涕泗而道之」。同時，繁子也殷殷告誡主婦不可有「輕侮其夫之意，以貽獅吼之譏，牝晨之誚也」。[104]

---

101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272-279；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102 「世界主義的婦人」一語見煉石（燕斌），〈留日見聞瑣談〉，《中國新女界雜誌》（東京），號 2（1907 年 3 月），頁 4。相關討論參見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 年的多元呈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51 期 4（2014 年 7 月），頁 118-132。

103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 年的多元呈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51 期 4，頁 196-224。

104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頁 19。

繁子這種「以夫爲尊」的觀點，看似傳統儒家「女卑」思想的老調重彈，實則是日本人對於中國儒家性別文化的一種片面理解或誤解，類似的觀點也見諸同一時期塚本濱子的家政教科書（下述）。這種日本觀點與中國儒家性別文化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是單向尊夫，並不提夫對妻應有如何的性格理解、理想支持和讓權；而後者雖然主張「男尊女卑」，卻更重視家道興旺，因此家內性別權力關係並非固定不變，在必要或緊急的情況下，夫與妻的職責可以隨時加以妥協和調整，以因應日益複雜多變的激烈社會競爭。此一區別與中日婦女地位不同的深層文化結構攸關，從中衍生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主婦的決策權等問題，也有不同的展現。

就中日婦女地位而言，繁子未曾有系統論述，她曾在〈支那婦人の特質〉中反覆提到中國婦女性格剛強、好勝心盛，並認爲此一特質過去爲儒教所壓制，今日受新教育的女性，反抗此一壓迫，渴望自由權利甚矣。[105] 繁子定調中國婦女的強勢特質，對比她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以女子柔順爲美德的觀點，其中抑揚之意不言可喻。就此而言，服部宇之吉的觀察是很好的輔助資料，這是因爲繁子爲其夫彌補了與中國名媛閨秀往來，深入理解其家庭狀況的私領域部分，在其中扮演蒐集資料的重要角色，故這些觀察一定程度上也投射出繁子的看法。服部宇之吉在中國任職期間，便注意到中國婦女地位崇高，非日本婦女可比，與他所知道「男尊女卑」的觀念更是不同。[106] 又說：「據我今日所觀察其

105 服部繁子，〈支那婦人の特質〉，《女学世界》，卷 12 號 7，頁 33-34、37。

106 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頁 495。

眞實景象，支那婦女對於男子的權力簡直類似美國之俗，足使德國婦女瞠目結舌。」[107] 他認爲原因是：「西洋人所以婦女權大，因爲尊重之；支那所以婦女權大，卻因爲歧視之。同爲女子權力之大，但是背後的原因則全不相同，諺語教訓男子不該和女鬥，男與女爭理非曲直爲恥，皆導致女子之跋扈。」至此他下一結論：「歐美對於女子的尊重，與支那對於女子的輕侮恰恰相反，卻相同導致女子跋扈之結果。」[108] 根據上述觀察，服部宇之吉認爲在中國興辦女學，有助於矯正此一「女尊男卑」的現象，回歸「禮」的規範，重建理想的性別關係。[109] 如此看來，中日婦女地位不同的先行條件，是影響繁子如何理解儒家文化的性別規範之重要因素。

同一時期，清末編譯日本家政學課本的中國作者，也注意到日本婦女地位不如中國，提醒中國讀者在譯介日本教科書時，須注意無形中吸入「女卑」之有害思想。如留日學生牛遜（1876-1934）譯編的〈最新家政學講義〉（1909 年在《女報》[110] 1-3 號連載），書序中便說：「近日譯日書，有一種莫大之病，其病惟何？即所譯者依然爲彼所謂適用之書，而非吾國適用之書也。」[111] 這種「莫大之病」是指什

---

107 服部宇之吉，〈支那古礼と現代風俗〉，《東亞研究》（東京），卷 2 號 9（1912 年 10 月），頁 10-19，後收入《支那研究 增訂本》（東京：京文社，1926），頁 587。

108 服部宇之吉，〈支那古礼と現代風俗〉，收入《支那研究 增訂本》，頁 599-600。

109 陳妵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10。

110 1909 年《女報》為陳以益創辦，不同於陳擷芬在 1902 年辦的《女報》。

111 塚本濱子著，牛遜譯述，〈最新家政學講義〉，《女報》（上海），卷 1 號 1（1909 年 1 月），頁 2。

麼呢？即「日本女學在亞洲為最盛，而日本女權在世界為最卑。譯日本女學書籍者，稍一不愼，非微無以振中國女學積弱之弊，而使女子不知不覺，反受一層無形之專制，天下可懼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乎？」故主張翻譯日本書籍，須「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斟酌吾國情形，損益書中內容。」[112]

牛遯〈最新家政學講義〉譯自塚本濱子（1866-1941）在1900 年由金港堂出版的《家事教本》，他為了避免因譯書引進日本「女卑」之思想，在論及家庭中婦女地位的關鍵處，特加以大幅改寫。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日文原著第一章〈家內之和平・對家長之心得對待良人之心得〉論及夫妻關係時說：「主婦要熟知家長之意向，即其理想與嗜好，使主義方針，歸於一致。辦理家事，務必恪守禮義，處事機敏，勿失敬意。家長在外為職務奔走，不辭勞苦，則為主婦者，宜表同情而欣然慰之。」[113] 強調主婦做事當以家長的意向為最優先，並實踐以夫為尊的最高準則。

牛遯的編譯本在第一章〈家內之和平・對待良人之心得〉中，一方面保留了上述日文原著中對夫妻關係的描述，另一方面卻透過增寫的文字來平衡日文原著「以夫為尊」的刻板觀點。如該節開頭說：「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為主婦者，其位置有對待之形，其職業則分功而治。」[114] 援引中國儒家經典來界定夫和妻為內外互補、各司其職的對待

112 塚本濱子著，牛遯譯述，〈最新家政學講義〉，《女報》，卷 1 號 1，頁 2。

113 塚本濱子，《家事教本》（東京：金港堂，1900），頁 4-5。

114 塚本濱子著，牛遯譯述，〈最新家政學講義〉，《女報》，卷 1 號 1，頁 3。

關係。其次，牛遜在原書「主婦要熟知家長之意向，知其理想與嗜好，使主義方針，歸於一致」之外，增加了「然爲良人者，亦不可不知妻君之理想與嗜好，……兩相體諒而後感情固結。」[115] 此一細部修改，強調夫妻之間的感情要堅固，必須是基於雙方的相互理解和付出，而非僅限於妻對夫的單向理解和付出。同時，他還告誡讀者絕不可執著於「夫爲妻綱」之說（上下關係），認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116] 牛遜編譯本所增寫的部分，透過《易經》內外互補的哲學論述、夫妻的情感互動和實際家庭生活的家務協作等不同面向，明確地將中國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爲與丈夫相輔相成的互助關係，修正日文原著單向尊夫的「女卑」觀點。

在中日婦女地位不同的前提下，中日作者對家內性別權力關係的討論也有所差異。如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所描繪的「內政總理」，便向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在家政管理中擁有至高權威和決策權的主婦形象，截然有別於繁子書中所描繪涕泣勸夫的溫順主婦。這種「內政總理」具有鮮明的貴族階層特色，植基於曾紀芬對周圍人事的觀察和自身的治家經驗。一是曾紀芬那位以精明幹練、讓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婆婆張太夫人，她自嫁入聶家後便一手掌理家中所有產業，手握財政大權，直到聶緝槼成婚後，張太夫人依然規定小家庭上繳收入，插手幫忙兒子謀求職位，乃至爲其經營田地房產，代爲購地起造新居等。二是曾紀芬在娘家和夫家發生財

---

115 塚本濱子著，牛遜譯述，〈最新家政學講義〉，《女報》，卷 1 號 1，頁 3。

116 塚本濱子著，牛遜譯述，〈最新家政學講義〉，《女報》，卷 1 號 1，頁 3。

務糾紛時，親自出面幫助協調各方人脈，經手相關錢項的出入事宜，如著名的玉振銀號涉訟案。又或者在丈夫遇到困難時，用嫁妝幫助夫婿度過難關。凡此皆可見「內政總理」在家庭財政中扮演自主性極強的關鍵角色，大不同於繁子所論的溫順主婦。[117] 乃至於對家庭經濟的調理，同樣是以貴族階層婦女爲預設讀者，曾紀芬倡導的是「力取」以獲取更多的財富，[118] 相對於繁子所言以量入制出的節儉法爲主，點滴累積以富家的方式。

另一方面，曾紀芬還提到爲了家族的繁榮發展，主婦可以不聽丈夫的意見，而採取最佳策略來保護家族。繁子以順從丈夫爲最高原則，卻未提到若夫做出危害家庭之事時，有何相應的救濟措施。換言之，在中國儒家的基本文化價值中，夫妻之間固然有禮從關係，然仕紳之家重視家道興旺及其未來發展遠勝於任何人與事，家長之妻作爲承擔家族發展的核心人物，在保管家庭財務時擁有的獨立權力和彈性空間，可因事或遇到緊急狀況而從權，所以婦雖以敬事丈夫爲準則，然而當丈夫作出危害家庭穩定的事情時，妻子基於「保財」無須忍受此種不良之人，並憑藉她在家庭財務中的獨立行動權，來阻止丈夫的作爲或反對丈夫的決策。[119]

了解中日婦女地位之不同，及中國家政另一種「女尊」的現象後，我們再回過頭來思考「家政」與「女權」之間，

---

117 周敘琪，〈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3，頁 40-41、43-45。

118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杭州：浙江官書局，1904），上冊，頁 45b-46a。

119 周敘琪，〈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3，頁 39-40。

究竟是彼此互斥，或者有相互協調、促進的另一種可能性？

在晚清政治改革運動中，「家政」議題是具有文化修養的女報人或閨秀作者參與家庭改革和振興女學的入手點，她們由此確立自己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大幅擴展一般婦女的教育範圍；也是婦女樹立家內權威或提升自己在政治改革中的地位之重要憑藉。學者們注意到此一現象，主張女性的能動性及其與男性知識份子的互動，在清末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由此修正 1898 年改革運動中強調男性領導的「父權國族主義」（"patriarchal nationalism"）觀點。如 1898 年中國第一份婦女報刊《女學報》，其女性主筆如薛紹徽（1866-1911）、裘毓芳（1871-1904）、李蕙仙（1869-1924）、李閏（1865-1925）、康同薇（1878-1974）等，便通過展示養蠶、女紅、家務和烹飪等，這些長久以來作爲女性家務組成部分的「有用」技能反駁男性改革者否定傳統的女性學習和家戶勞動的謬誤攻擊。[120] 曾紀芬撰作的《聶氏重編家政學》則是另一個彰顯婦女同胞管理家庭的實踐事例，該書乃是曾紀芬在父親曾國藩教導、培養的改革思想基礎之上，有意識地透過對下田氏家政學的譯介、改編，來參與清末重視婦女的「齊家之術，隱寄於治平」[121] 之女學論辯，並順應當時男性與女性的改革者希望通過譯書報刊進行振興女學

[120] 相關討論參見 Nanxiu Qian,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23-184. 對戊戌變法的重新省思，也見 Rebecca E. Karl and Peter Zarrow, eds.,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121] 薛紹徽，〈女學報序〉，《女學報》（上海），期 1（1898 年 7 月），頁 2-3。

和改革家庭的時代趨勢。[122] 這些都與繁子強調重家政抑女權（無論是婦女的家庭地位或政治行動）的互斥觀點，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其次，中國的改革者重視女性的家庭責任，卻未將女性活動的範圍限縮於家庭之中，藉此反對女性參與政治行動或擁有參政權。辛亥革命前有關「女權」的討論中，曾出現過四種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做國民之母」、「盡與男子一樣的任務」、「摸索新角色」以及「拒絕做女國民」（拒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的女性解放）。由金天翮（1873-1947）、蔣維喬（1873-1958）等人提倡的「做國民之母」，是他們在近代思想轉型過程中摸索新女性形象的主要構思，主張女性要恢復「天賦人權」，並貢獻於國家。「家政」作爲齊家教子之學，乃是該派人士整合傳統性別角色和救亡中國，強化女性是革命不可或缺之條件的重要思想依據。[123] 這種「做國民之母」的看法雖未擺脫傳統性別意識的束縛，然其背後連結的是男女平等的主張，也認同女性因在家庭內扮演重要角色而應該得到參政權。

相較之下，繁子堅持女性的責任就是承擔家務整理，徹底反對女子參政或出外工作，並透過倡導中國禮制的「夫爲妻綱」或三從矯正中國「女尊」之現象，可說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性別文化的誤解或過分僵化的理解。無怪乎當時女報人

122 周敘琪，〈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3，頁 12-24。

123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45-49。亦參見須藤瑞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51-79。

堅決反對自日本傳染而來的「賢母良妻」教育，宣稱「日本之流毒不可不去」，因其核心思想不在發達女學和女權，而是「先與女子以少許之教育，而仍奴之，此所謂高等下女教育也」。[124]

那麼，日本方面的女權運動者對繁子這種重家政抑女權的主張有何看法呢？早在明治初期，以福澤諭吉（1835-1901）、森有禮（1847-1889）爲首的啓蒙思想家深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開始提出男女同權、一夫一妻制、廢除娼妓制度、女子擁有財產權、女性教育權等婦女解放主張。[125] 到了明治中期，隨著西方「天賦人權」學說的不斷湧入，自由民權運動亦蓬勃發展，以楠瀨喜多（1836-1920）、岸田俊子（1863-1901）、福田英子（1865-1927）爲代表的知識婦女，展開了一系列有關選舉權、經濟獨立、男女同權的社會抗爭活動。如 1880 年明治政府頒布法令，承認女戶主的參政權利，即是楠瀨喜多向官方不斷抗爭的成功事例。岸田俊子具有強烈的自由民權意識，批判以儒家思想爲基礎的《女大學》對女性的束縛，爲此她多次在關西各地發表演說，並撰寫大量時事評論，號召女性覺醒，反抗日本自古已有的「男尊女卑」惡俗。福田英子聚焦於女性經濟獨立問題，爲貫徹自己的女性主張，她曾創辦女子實業學校，試圖幫助女性掌握一技之長，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另一方面，福田英子也是近代日本傑出的婦女運動家，她早年投身於自由民權

124 陳以益，〈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卷 1 號 2（1909 年 2 月），「論著」欄，頁 6、7。

125 如福澤諭吉在抨擊陳舊的身分等級制度和封建思想時，儒家「男尊女卑」也成為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森有禮〈妻妾論〉則分析現實社會中男女的不平等現象，提倡「一夫一妻制」等近代文明的家庭觀。

運動，闡揚民權擴張對於女性解放的重要性，積極爲婦女參政權而奮鬥，晚年則轉向社會主義，以推翻壓迫婦女的社會制度爲目標。[126]

不過，這波女權運動到了明治後期便遭到重大打擊。這是因爲自由民權運動直接威脅到天皇的統治，故引起明治政府的恐懼和警惕，開始對自由民權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進行打壓。當時明治政府制定了三種政策限制日本婦女的權利：

（一）1890 年，明治政府頒布的《集會及政社法》規定，禁止女性參加政治集會和政治結社。

（二）1892 年明治《民法》正式實施，它以法律形式將女性限制在夫權的管轄和統治下，女性甚至無權處理家庭財產。

（三）向女性灌輸賢妻良母教育，使其爲國家意識形態而服務。[127]

此後日本女權運動不得不以文學敘事的方式，輾轉透過描繪女性所處的悲慘境地，引導社會輿論和博得大眾的同情與認可。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低潮期尚有留美女學生津田梅子（1864-1929）於 1900 年創辦的女子英學塾，以推動女子高等教育，倡導女性應接受與男子同等的教育並爭取工作崗位。[128] 到了 1911 年 6 月，平塚雷鳥（1886-1971）創立「青

126 肖霞，〈日本近代女性解放運動的肇始〉，《山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12 期，頁 83-87。

127 趙蓉，〈由女性語言變遷看日本社會發展的軌跡〉，《日本學刊》，2011 年第 3 期，頁 132。楊本明，〈日本近代女權主義運動流變考〉，《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卷 38 期 1（2016 年 1 月），頁 50。

128 吉川利一，《津田梅子》（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韜社」[129] ——近代日本史上第一個全部由女性社員組成的社團組織，她們一起集中研究、探討女性自身的問題，其機關刊物《青韜》高舉女性解放的旗幟，開啓了日本女性解放運動的新篇章，並產生了一個新名詞「新女性」，她們反對偏見，反對封建家庭制度和賢妻良母的觀念，追求女性本身的愛情和性的自由。[130]

據此可知，服部繁子在《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倡導重家政抑女權的觀點，與明治中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有所扞格，繁子深「憂」這種過於激進的女權論述，而女權運動者則反抗「賢母良妻」的女子教育，冀望推翻壓迫婦女的社會制度。不過，實際上兩者並無正面交鋒的機會，《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出版於 1908 年 5 月，正值 1890-1911 年間的日本婦女解放運動之低潮期，國家明令禁止婦女參政、全力支持賢妻良母教育居於主流地位，繁子在書中重家政抑女權的主張與之若合符節，卻與津田梅子傾向於女子擁有獨立人格和工作權的主張不同，若說《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是飽含日本主流女學意識形態向中國輸出的一個事例，亦不爲過。

129 「青韜」源於英文 blue stocking 一詞，意指 18 世紀中期英國倫敦一群熱愛知識和文學的女性。這些上層階級女性學習法國沙龍，經常邀請傑出的文人一起討論文學和知識話題，即使如 Benjamin Stillingfleet 這樣買不起華麗服飾，僅能著日常衣服和普通藍襪子出席的優秀作家，亦在邀請之列，故反對者以「藍襪協會」嘲諷之。但這群女性超越此一貶低意圖，並採用這個綽號作為該社團的名稱。

130 堀場清子編，《『青韜』女性解放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91）。肖霞，《元始女性是太陽：青韜及其女性研究》（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于華，《《青韜》與日本近代女性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結論

服部繁子的《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乃日籍女教習爲「清國適用」所量身定制的一本家政教科書，緣起於她隨丈夫服部宇之吉來華任職，爲了在現實生活中推行女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服部夫婦協助沈均夫婦創辦北京第一所女學校——豫教女學堂，冀望藉助此一實際示範，消除人們對於女學的疑慮，繁子並任該校的女經理、贊成員和名譽教員、女教習。

《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一書即是服部繁子任豫教女學堂的家事課教習，爲了授課需要而編寫相關課程教材，再加以修訂成書。該書的預設讀者並非平常女性，而是如豫教女學堂生徒一般的上流貴女。豫教女學堂促成清廷當局（特別是慈禧太后）對女學校政策的轉變，也見諸《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卷首的記述。在寫作語言方面，繁子雖通中文，但尚未達到以中文寫書的水準，故原書稿以日文寫作，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學生陸紹治譯成中文，由日本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冨山房將之納入國民教育書籍出版流通。

作爲晚清最早一批跨國遷移、促成中國女子教育現代化的日籍女教習，服部繁子對於何爲「清國適用」的家政學，有屬於自己的女學立場和特定看法。時當中國女學校草創之時，繁子興女學的行動具有革新傳統的進步意義，但由她與秋瑾的交往來看，繁子對婦女新角色的設定，僅限於女子透過貢獻家庭以興國，反對更激進的女子參政、公共活動、甚或世界主義的女權論述。爲了讓清國上層婦女更好地容受此一新學科，她以恩師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爲底本，倡導

一種結合中學與新知的編輯理念，並透過章節架構的巧妙安排，將之貫徹於《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

總體而言，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所謂「參酌古今」的「古」，與中國傳統女教書的內容無涉，而是帶有特殊日本觀點的中國儒學，講求以「禮」盡孝的精神將中西家庭制度區別開來。這種「他者之眼」注意到中國貞節制度對女性的束縛，然其觀察著眼於字面意義，往往忽略背後複雜的社會脈絡——婦女守貞並非全然是被動性的被迫接受，也可以是主動性的用來作爲性別秩序的突破口。其次，該書在西學新知方面大幅引入「生理學」知識，明顯受到服部宇之吉重視「生理學」的中國教育觀點影響，同時介紹了中國當前重大疾病的最新治療方式。書中亦花費大篇幅教導上流社會名媛與外國人往來社交、西餐禮儀等，未見於他本家政教科書，亦是該書特色。

同樣以「適合中國」爲名對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進行改編，另本 1903 年出版曾紀芬的《聶氏重編家政學》，則呈現出與繁子著作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是曾書明顯受到傳統家訓、女教的影響，關注主家政者的道德人格追求，有別於繁子以「男尊女卑」代表中國禮教。二是曾書中描繪仕紳之妻在清代社會流動和家庭策略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凸顯主婦對家庭的巨大貢獻，從中衍生而出的家庭性別權力關係，與下田氏和繁子的「女卑」理想不乏牴觸之處。三是關於「家庭衛生」問題的討論，下田歌子和服部繁子主要從西方科學理論討論疾病和健康，而《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言的「衛生」，則是以中國傳統醫學「養生」爲基本內涵，講求陰陽五行的搭配、調和，與現代科學的「衛生」概念有所不

同。此外，曾書中並未特別介紹與西人往來、西餐禮儀，這點與《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也有所不同。曾紀芬作爲總督之女和上海實業家之母，自不乏與外人接觸、用餐之機會。顯然繁子對西餐禮儀的重視別有考量，應與她以「禮」入手中國文化，以及受教學生的特殊需求有關係。至於其他多種與中國民情相適應的衣食住之家務技藝，兩書做了不同安排，這類細小的調整可依氣候、環境或習俗因地制宜，大抵無關宏旨。

《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另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關於家政和女權的論辯。繁子在卷首「女權與女子智育之關係」中高聲呼籲中國女性重視家政，盡治家育兒的國民義務，以獲得「世人之尊重，女權不求而自得」；反對當時中國改革者所倡導爭取參政權、經濟權等相關制度之平等的「女權」論述。這種將「家政」與「女權」對立起來的觀點，與中日婦女地位大不相同密切相關，繁子極力鼓吹中國婦女在家庭之內應貫徹「尊夫」的準則，冀望回歸儒家「男尊女卑」的理想，類此論調遭到中國編譯者的無情抨擊，視之爲「病」與專制枷鎖；一方面中譯本補充了《易經》內外互補的哲學思想、夫妻的情感互動和實際家庭生活的家務協作等不同論述，來修正、平衡這種過度傾斜的「尊夫」思想。

曾紀芬則提出「內政總理」一詞，凸顯另一種在家政管理中擁有至高權威和決策權的主婦形象，截然有別於繁子書中所描繪涕泣勸夫的溫順主婦，由此翻轉家內的性別權力關係。曾紀芬也講「婦道」（《禮經》的德、言、容、功），但當丈夫作出危害家庭穩定或發展的事情時，她強調妻子可以憑藉其獨立行動權來權宜行事，阻止丈夫的作爲甚或反對

丈夫的決策。

如此看來，由於中日國情的不同，「家政」呈現的婦女地位也不盡然是自我壓抑的「女卑」樣貌，也有展現自我才智「女尊」的另一種可能。在清末改革運動中，我們進一步觀察到：「家政」與「女權」之間不一定是兩個互斥的概念，也可以是相互促進。當時具有文化修養的女報人或閨秀作者，藉由參與家庭改革和振興女學確立自己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男性改革者則認同女性因「做國民之母」，在家庭內扮演重要角色而應該得到參政權。這表明「家政」是婦女貢獻於家國的起點，並不妨礙婦女向外發展或參與公共事務，而非如繁子所主張將婦女圈限於家庭中的桎梏。

另一方面，日本的女權運動者是如何看待繁子重家政抑女權的主張呢？自明治初期推廣西學起，啓蒙思想家便已提出男女同權、一夫一妻制、女子擁有財產權、教育權等婦女解放主張。到了明治中期，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知識婦女亦展開了一系列有關選舉權、經濟獨立、男女同權的社會抗爭活動。然由於自由民權運動對日本天皇的統治造成威脅，1890 年起政府開始打壓自由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直到 1911 年《青鞜》創刊前，日本女權運動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低潮，政府主導的「賢妻良母」女子教育和禁止婦女參政的政策占據上風。1908 年 5 月繁子出版《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正處於此空窗階段，該書的編輯理念與此前女權論述有所扞格，而與日本政府對女子教育的宗旨遙相呼應，應與日本女學意識形態對中國輸出有相當關係，值得未來再探。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報刊

《大公報》（天津），1902、1903、1904。
《女学世界》（東京），1912、1914。
《女報》（上海）， 1909。
《女學報》（上海），1898。
《中國新女界雜誌》（東京），1907。
《東方雜誌》（上海），1905。
《東亞研究》（東京），1912。
《時報》（上海），1907。
《順天時報》（北京），1907。
《學部官報》（北京），1906。

（二）中文

汪輝祖，《雙節堂庸訓》。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服部繁子，《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東京：冨山房，1908。

服部繁子著，高岩譯，金中校，〈回憶秋瑾女士〉，收入郭延禮編，《秋瑾研究資料》。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頁167-170。

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譯自服部宇之吉主編，《北京志》。東京：博文館，1908。

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收入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　近代初編》。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9-28。

惠毓明編述，《吳芝瑛傳》。江蘇：無錫雙飛閣藏版，1936。

曾紀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上海：京城印書局，1933。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曾紀芬，《聶氏重編家政學》。杭州：浙江官書局，1904。

煉石（燕斌），〈留日見聞瑣談〉，《中國新女界雜誌》，號2，（1907年3月），頁4。

叢琯珠，《新編家事教科書》。東京：中國新女界雜誌出版社，1906。

（三）日文

下田歌子，《家政學》。東京：博文館，1893。

下田歌子，《新選家政學》。東京：金港堂，1900。

服部宇之吉，〈支那古礼と現代風俗〉，《東亞研究》，卷2號9，（1912年10月）。收入氏著，《支那研究　增訂本》。東京：京文社，1926，頁587-599。

服部宇之吉，《心理學講義》。東京：東亞公司，1905。

服部宇之吉，《北京籠城日記》。東京：博文館，1900。

服部繁子，〈支那婦人の特質〉，《女学世界》，卷12號7，（1912年5月），頁33-38。

服部繁子，〈卒業式の回顧〉，《女学世界》，卷14號7，（1914年5月），頁52-55。

服部繁子，〈秋瑾女士の思い出〉，《季刊東西交渉》，卷1號3（1982年9月），頁38-49。

東亞同文會編，《續對支回顧錄（下）》。東京：大日本教化圖書，1941。
塚本濱子，《家事教本》。東京：金港堂，1900。

二、專書

（一）中文

于華，《《青鞜》與日本近代女性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肖霞，《元始女性是太陽：青鞜及其女性研究》。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
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周佳榮，《瀛洲華聲：日本中文報刊一百五十年史》。香港：三聯書店，2020。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汝綸）年譜》，北京：雍睦堂從書本，1944。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費絲言，《從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98。
須藤瑞代，《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

性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閻書昌，《中國心理學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盧葦菁著，秦立彥譯，《矢志不渝：明清時期的貞女現象》。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

（二）日文

吉川利一，《津田梅子》。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堀場清子編，《『青鞜』女性解放論集》。東京：岩波書店，1991。

（三）西文

Karl, Rebecca E., and Peter Zarrow, eds.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Qian, Nanxiu. *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三、論文

（一）中文

衣若蘭，〈近十年兩岸明代婦女史研究評述〉，《臺灣師大歷史學報》，期 25，1997 年 6 月，頁 345-362。
衣若蘭，〈最近臺灣地區明清婦女史研究學位論文評介〉，《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6，1998 年 8 月，頁 175-187。
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中國婦女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卷 7 期 2，1996 年 6 月，頁 139-179。
肖霞，〈日本近代女性解放運動的肇始〉，《山東社會科學》，2009 年第 12 期，頁 83-87。
季家珍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卷 12 期 2，2001 年 6 月，頁 1-40。
季家珍著，李濤、史靜寰譯，〈女性教育中的文化與文本傳播：歷史情境中的 20 世紀早期女性課本〉，《法國漢學》，第 8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34-371。
林麗月，〈從性別發現傳統：明代婦女史研究的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3，2005 年 12 月，頁 1-26。
周叙琪，〈從「功課單」到家政學——《聶氏重編家政學》所見晚清閨秀的家政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43，2024 年 6 月，頁 1-57。
周愚文，〈吳汝綸日本教育考察與對晚清學制建立影響程度的再探討〉，《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卷 60 期 3，2015 年 9 月，頁 127-151。
素曼恩，〈寡婦在清代宗族社會、等級和地域結構中的位置〉，收入蘆葦菁等編，《蘭閨史蹤：曼蘇恩明清與近代性別家庭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頁 1-26。
夏曉虹，〈秋瑾北京時期思想研究〉，《中國文哲所研究通訊》，卷 10 期 3，2000 年 9 月，頁 77-86。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關照〉，《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67-113。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 年的多元呈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51 期 4，2014 年 7 月，頁 118-132。
夏曉虹，〈作爲國民常識的晚清女子啓蒙讀物〉，《讀書》，2015 年第 4 期，頁 73-78。
孫長亮，〈清季日本女性教習拾遺〉，《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9，2017 年 6 月，頁 157-194。
孫麗青，〈服部宇之吉與近代中國教育〉，《齊魯學刊》，2009 年第 3 期，頁 58-61。
陳定山，〈小萬柳堂與李文忠公全集〉，《春申續聞：老上海的風華往事》。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76，頁 65-66。
陳捷，〈《（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中的西洋飲食及西餐禮儀〉，《南國學術》，卷 13 期 3，2023 年 7 月，頁 397-409。
陳瑋芬，〈服部宇之吉の「孔子教」論——その「儒教非宗教」說・「易姓革命」說・及び「王道立國」說を中心に——〉，《季刊日本思想史》，期 59，2001 年 9 月，頁 49-68。
張洪萍、胡韜，〈服部宇之吉與京師大學堂師範館〉，《貴州師範學報》，2014 年第 7 期，頁 52-56。
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卷 10 期 2，1999 年 6 月，頁 29-76。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收入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37-57。
黃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攬要〉，《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5，2015 年 6 月，頁 193-232。
楊本明，〈日本近代女權主義運動流變考〉，《上海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卷 38 期 1，2016 年 1 月，頁 48-51、69。
趙蓉，〈由女性語言變遷看日本社會發展的軌跡〉，《日本學刊》，2011 年第 3 期，頁 126-138。
閻書昌，〈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學講義》〉，《心理學報》，2009 年第 5 期，頁 464-470。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272-279。
羅秀美，〈從閨閣女詩人到公共啓蒙者——以近代女性報刊中的論說文爲主要視域〉，《興大中文學報》，期 22，2007 年 12 月，頁 1-46。

（二）日文

山根幸夫，〈服部宇之吉と中国〉，收入《近代中国のなかの日本人》。東京：研文出版社，1994，頁 5-42。
水野博太，〈論近代日本的「孔子教」——以服部宇之吉爲例〉，《東洋文化研究》，號 19，2017 年 3 月，頁 33-62。
加藤恭子，〈二〇世紀初頭における、中国への日本の女子教員派遣と「東洋婦人会」——中国の女子学校教育の実施にむけた協力活動について〉，《お茶の水史学》，號 57，2014 年 3 月，頁 49-85。
加藤恭子，〈20 世紀初頭における日本人女子教員中国の派遣〉，《ジェンダー研究》，號 18，2015 年 3 月，頁 73-85。
加藤恭子，〈明治末の日本人女子教員の中国派遣〉。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人間文化創成科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22。
佐藤尙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国女子教育〉，《教育科學》，期

24，2001 年 3 月，頁 5-34。

服部武，〈濱尾先生と父〉，《漢学会雜誌》，卷 7 號 3，1939 年 9 月，頁 125-129。

服部武，〈服部宇之吉博士（1867-1939）〉，東方学会編，《東方学回想 I 先学を語る（1）》。東京：刀水書房，1973，頁 109-134。

服部武，〈服部宇之吉博士略年譜〉，《東方学》，第 46 輯，1973 年 7 月，頁 185-186。

陳捷，〈安井小太郎《寓燕日記》解題・翻刻〉，《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冊 183，2023 年 3 月，頁 1-58。

韓韡，〈中国近代女子教育における日本受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日本語専攻博士論文，2014 年 3 月。

（三）西文

Joan Judge（季家珍）. “Meng Mu Meets the Modern: Female Exemplar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Textbooks for Girls and Women.”《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8，2000 年 8 月，頁 129-177。

Joan Judge（季家珍）. “The Ideology of ‘Good Wives and Wise Mothers’: Meiji Japa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Feminine Modernity in Late Qing China.” In Joshua A. Fogel ed.,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astBridge, 2002, pp. 218-248.

A Japanese Female Teacher's View on Chinese Domestic Science in Hattori Shigeko's *Qingguo Jiating Ji Xuetang Yong Jiazheng Xue*

Chou Hsu-Chi*

Abstract

Qingguo jiating ji xuetang yong jiazheng xue 清國家庭及學堂用家政學(*Applied Domestic Science for the Home and School in the Qing State*), was compiled by the Japanese teacher Hattori Shigeko 服部繁子(1872–1952) based on her lecture notes from Yujiao Girls' School in Beijing. This work touts its applicability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advocates a home economics approach that comb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with "modern knowledge." Her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however, does not refer to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namely ***nüjiao*** 女教, but rather a Confucianism that emphasizes propriety and filial piety that carries a uniquely Japanese perspective: it focuses on reshaping the norms of "male superiority and female inferiority," "modern knowledge" introduces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physiology"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on hygiene. The work also discusses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between high-society socialites and

* Assistant Research Scholar (NSTC),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oreigners, Western dining etiquette, and related topics. These features different completely from Zeng Jifen's 曾紀芬(1852–1942) *Nie shi chongbian jiazheng xue* 聶氏重編家政學(*Domestic Science as Recompiled by Née Nie*), which emphasizes "suitability for China." The latter focuses more on the pursuit of moral character by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based on traditional family precepts, the lofty authority of the "domestic bursar"內政總理,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method of the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theor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discussions in Hattori's work regarding home economics and "women's rights" are likewise noteworthy as they highlight that under the shared definition of "home economics," namely *jiazheng* 家政, in China and Japan, the gender relations presented differ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se respective nations. In this regard, one may ask whether "home economics," and "women's rights" were mutually exclusive or mutually supportive? Hattori's promotion of new education for wome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in which she called on Chinese women to value domestic affairs to gain people's "respect" and advocated the idea of "female inferiority," thereby confining women to the hom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Chinese reformers and female journalists declared that women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state and the family through home economics, but this new role was only a starting point that did not hinder women from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affairs, or from striving for equality within the social system. They even reminded textbook translators to note the fact that Japanese women's rights were the most detrimental in the

world, so as not to disseminate the "poison" of Japanese women's education.

Keywords: Hattori Shigeko, domestic science, home economics, housewife, women's rights, Japanese female teacher